



式的就地转移，不应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地域转移的唯一指导方针。

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异地转移，离土又离乡、进厂也进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首先，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相对集中于一个地域，可以产生集聚效益，避免由于生产的分散布局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其次，较为集中的产业布局较之遍地开花式的分散布局，可以大量节约耕地的占用，在耕地日益锐减的中国，这样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后，工业的相对集中，可以减少和易于治理由于产业布点分散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由于乡镇企业发展给农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至于异地转移，又要求进一步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今后主要是向原有城市转移，还是向新建城镇转移。在今后一个时期，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原有城市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发展城市建筑业、商业、服务业，解决城市某些工作岗位就业难的需要。但是，在城市现行管理体制下，在城市自身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并保证有一定收益，还需要国家大量财政补贴才能维持的条件下，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是国家物力、财力所难以承受的，同时也超过了城市现有基础设施的负荷。因此，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今后将主要向一些新兴城镇集中。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已形成了一批新城镇。这批新城镇没有也不可能依赖国家投资，一般都是由农民自己集资兴建的。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一批崭露头角的农民渴望进入城市，以便更好地利用城市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把非农产业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并提高自己及家庭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因此，农民愿意付出一定费用作为进入城市的代价，而因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农民也完全有能力付出这样的代价。看来，由农民集资兴建新城市今后必将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在中国大地上现在出现的



第一批农民城，只不过刚刚揭开农村城市化的序幕。目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业已通行几十年的户籍管理制度与城市化迅猛发展的现实极不适应，如何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解决这一矛盾已是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今后城乡关系变动的一个主要趋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需要解决的一项重大任务。至于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的实现，则只能是遥远未来的事。过早提出这样的社会经济目标，是超阶段的，因而也是无法实现的，并且会分散和忽视人们对现阶段提高城市化水平这一主要任务的注意。



第二章

坚持和深化农村改革

十年来，在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农村经济突飞猛进，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但是，无庸讳言，我国农业发展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不仅需要正视和研究导致1985年以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连续徘徊数年的深层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而且需要展望和规划90年代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研究如何推动我国农业再上新台阶，逐步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实践业已充分表明，我国农业过去的大发展是在改革的推动下取得的，同样，今后要从根本上摆脱农业徘徊不前的困境，并进而实现我国由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改革仍然是主要推动力。我们不仅要坚持原已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改革措施，而且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第一节 稳定和完善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现阶段，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要处理好稳定和完善的^①关系。稳定是完善的前提，完善又能促进稳定。为了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需要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矛盾，从多方面采取必要和可行的措施，包括：加强集体经济实力，建立和健全农村经济服务体系；实行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即建立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制度，以抑制和克服农民不愿向土地投入、对土地实行掠夺式经营的短期行为；加强法制观念，尊重承包合同，并保证其兑现；加强承包合同管理，并促使其逐步规范化；逐步解决土地分割细碎问题，以提高经济效益；等等。

近年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指责越来越多，概括说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性质问题，即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最典型的说法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二是能否有效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有的同志把近年来农业徘徊归咎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说什么“农业的徘徊就是道路的徘徊”。

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我们说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主要是因为：（1）它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农户向集体承包土地，对于土地这一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户只有经营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无权出卖或出租土地。（2）它置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之下。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般说来，集体经济组织仍继续保持和履行“统”的功能，集体的许多重要决策体现在承包合同之中，农户有义务按照合同进行生产，承



担经营责任，并按规定分配收益。针对干部和群众中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性质的疑虑，中央在有关文件中曾多次明确指出，联产承包制属于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形式，充分肯定了农民群众在改革中的伟大创造，指出联产承包制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决不能走回头路。

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我们的政策和行政手段的基础，是要使整个先锋队联系全体无产阶级群众，联系全体农民群众。如果有人忘记了这些小轮子，而醉心于行政手段，那就糟了。”^①邓小平同志在1962年7月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能否采用“包产到户”、“责任到田”这样的生产经营形式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用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采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②

至于把近年来农业徘徊归因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也有必要做一点讨论。8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经济改革措施，调动了农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47页

^② 《邓小平文集》(1938~1955)，第305页。



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带来了1984年农业大丰收，这是有口皆碑的客观事实，已为国内外所公认。1985年以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连续几年徘徊不前，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对农业形势判断错误所导致的工作失误。当1984年农业大丰收之后，有的同志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情绪，认为我国农业已形成自我发展能力；粮食问题已经过关；要加速粮食转化，鼓励大家多吃肉；今后中国不需要进口粮食，而且可以成为粮食出口大国；等等。正是在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在价格政策和农业投入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措施，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延误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从而造成了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减产与徘徊。

当然，这并不是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尽善尽美，不存在什么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家庭作为生产经营基本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总体上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同时，也已开始显露不相适应的某些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加强集体经济实力和发挥统一生产经营服务的功能注意不够。安徽省安庆市对八县一郊的调查表明，在某些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主要是：（1）放松了建立和健全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集体所有权名存实亡；（2）放松了农村合同的管理工作，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手段散失；（3）放松了集体提留的落实工作，集体积累名存实亡；（4）放松了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和农业基础设施管理工作，加大了农业生产家庭经营的分散性和封闭性所造成的困难；（5）放松了在农村经济新情况下大包干责任制的稳定和完美工作，在土地使用上新开“大锅饭”。上述问题的实质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变形失真，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有滑向变相私有的危险。

我们坚持农村改革的方向，同时也要坚持农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既要继续保持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



又要从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和加强集体经济的实力，更充分地发挥“统”的方面的功能，其中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当然，不能把社会化服务等同于双层经营中集体组织的全部功能。除了社会化服务，集体组织还要承担生产经营环节的组织、协调、管理任务，既包括农业生产，也包括非农部门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可以而且应当指出，社会化服务是集体组织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

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有其优越性，也有其局限性。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是克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发挥其优越性的有效措施。

同时，通过社会化服务，不仅能够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还能引导农村经济的走向，完善农村的上层建筑，寓指导于服务之中。在农业内部，社会化服务与家庭经营相结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收到生产规模大小以外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效益。在农业外部，在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在亿万农户的商品经济活动与国家计划之间，通过社会化服务可以在它们中间架起一座连接的桥梁，并且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要求，在资金、技术以及物资的扶持上，体现出鼓励或限制的政策导向。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稳定又要完善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为特征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国农业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节 继续坚持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 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方针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发展中国家改造以单一农业发展为特征的传统农村经济结构,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实现经济现代化宏伟目标,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必经道路。无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都没有例外。不言而喻,由于国情各异,一国产业结构转变和城市化道路又必然带有各自特点。

虽然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同样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但是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不能象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直接转入城市,实现经济均质化和向一元经济转变的目标。人口多、劳动力多,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人口简单迁入现有城市的做法。同时,由于中国在解放以后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了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方针,建立了一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福利补贴制度在内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因而逐渐形成了以城乡隔离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从50年代开始的国家工业化,实质上是城市工业化。正是上述国情特征和城乡隔离体制决定了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能另辟蹊径。中国农村工业化任务就是在这样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在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即70年代前的社队企业和80年代后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所谓艰难,一是因为我国,特别是农村的自然经济基础特别深厚,因而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受到自然经济的束缚;二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左”的失误,把农



村非农产业当作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想方设法要割掉这条“资本主义尾巴”。所谓漫长，指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极为缓慢，历经反复。先是在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作为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农村企业，几乎全部被消灭了。以后又在农村贯彻“以粮为纲”的产业指导方针，进一步砍掉了农业中的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化进程中幸免于难的某些非农产业，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多年中，也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在经济缝隙中顽强挣扎，数量很少，发展很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乡镇企业命名的农村非农产业才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近10年来，乡镇企业发展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是，从总体上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蒸蒸日上的势头。

现在，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一支无法取代的重要力量。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3400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上升到60%以上。一年为国家创汇100亿美元。乡镇企业10年来累计向国家纳税144亿元，近年来国家税收净增部分，乡镇企业提供的占一半以上。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乡镇企业发展是中国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0年来，随着乡镇企业发展，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入乡镇企业。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88年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为8 607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的农村劳动者。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全国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22个村的189 006个劳动力的调查，兼业劳动力折算成全年性转移劳动力的数目为16 144人，占所调查的劳动者总数的12.3%。按此比例推算，我国农村转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在8 607万人基础上，还要再加上3 775万人，总数为12 382万人。另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司资料，1988年乡镇企业职工总数为9545万



人,再加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金融、邮电通讯等不属于乡镇企业部门的农村劳动者2408万人,在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实际人数达到11954万人。上述两组统计数据基本是一致的,即我国目前在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者大致在1.2亿人左右,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近1/3,已接近在全民所有制部门就业职工1.3亿这个数字。10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农村乃至城乡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动,促进了农村经济总效率的提高,加快了农村一些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开辟了一条以劳力代替资金的发展非农产业的道路。农村改革冲破农村劳动力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状况,极大地增强了农村经济的活力,为我国农村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

但是,前进道路不可能永远是笔直的。在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发展乡镇企业和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指责多起来了,甚至怀疑发展乡镇企业和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方针的正确性。

发展乡镇企业和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关系到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是我国传统农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转变的关键。因此,今后既要继续解决近年来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又必须继续坚持发展乡镇企业和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方向,对此不能有任何动摇。

近年来乡镇企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速度过高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在有的地区近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存在过多过快的情况。通过治理整顿,今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规模要与原材料、能源的供应相适应,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数量要依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以及农业自身的承受能力来决



定。目前乡镇企业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主要表现在与城市产业结构相似，而且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因而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发生了“争”和“挤”的矛盾。今后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应主要选择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工业，与城市大工业配套的零部件生产，以及传统手工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结构安排，也要与此相适应。在治理整顿期间，除了解决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过高和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还要注意解决好乡镇企业管理混乱和对环境的污染问题。

我国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本来是一个客观事实。可是在1988年下半年提出治理整顿任务后，有的同志对“农村劳动力过剩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我国农业的现状说明，投入农业的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把近年来农业出现“徘徊”、“萎缩”归咎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看来，对这些看法的是非曲直，有必要作一些讨论。

我国农业劳动力是否存在剩余，这本来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国农业劳动力剩余是相对于农业生产的其他资源，主要是土地稀缺的剩余。我国解放初期，一个农业劳动力大约负担8亩耕地，随着农业人口、劳动力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现在已降至4亩左右。需要指出的是，建国4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化肥、农药的使用日益普及，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收到一定成效，而正是在这样条件下劳均耕地面积却减少了一半。仅此一点，就可以明显看出农业劳动力存在剩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考虑到精耕细作的因素，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劳动力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的结论也是可以肯定的。

现在，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计算数字，国内外学者还不一致。我国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和运用人均耕地负担法计算的结果，认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约在6000至8000万人之间。中外学者根据典型调查资料，运用平均产值计算法、工日计算法



等不同方法，认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约在8000万~1.5亿左右。综合各家估算，可以认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约占农业总劳动力的1/3，绝对数在1亿人左右。

10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之所以突出和为人瞩目，主要是由于以下两点：第一，农村改革，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个人干了过去几个人的活，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劳动力出现了更多的剩余；第二，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淹没在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之中，而且森严的城乡壁垒和户口身份，又把农业剩余劳动力死死地束缚在农村之中。虽然户籍管理制度迄今尚未根本改变，但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干活，终于在城乡隔离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小口，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加快。

如何评价近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是又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给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影响，由农业劳动力转移引发出来的农村经济、甚至国民经济发展的痛苦，要比劳动力转移的进步性更为广泛和深刻。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1985年以来的农业徘徊，不能说是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农村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投入政策失误造成的。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不仅是近几年的事，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农业剩余劳动力即已开始较多地向外转移。1981~1984年，我国农村非农劳动力总量增长70.8%，年均增长19.5%，与此同时农业也获得了空前丰收。1984~1988年，非农劳动力总量增长65%，年均增长13.6%，低于前4年非农劳动力增长速度，但农业却徘徊不前。所以，从总体上说农业徘徊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



外转移没有直接关系。至于说到由于农业精壮劳动力转出过多，“精兵强将跑四方，老弱病残务农忙”的个别地区，农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是确实的，但不能以偏概全得出上述一般性结论。

其次，10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推动乡镇企业发展，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是很好的。长期滞留在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不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由于过去闲置的农业劳动力在其他非农产业就业，人均产值一般都高于农业，因而也促进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0年来，仅在乡镇企业新就业农民就有5000万人左右。这批劳动力如果由国家安排就业，按安排一个劳动力需要投资一万多元的低标准计算，就需要资金5000亿元，那是国家财力根本无法承受的。

再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虽然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有时甚至漫流横溢，给城乡的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不少干扰。但是，从主流上看，则应给以肯定。今天在全国范围流动的农民工，已非昔日闯关东、走西口的逃荒者。他们流向的主要地区，是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新兴的经济特区，以及正待开发的海南岛、伊犁河谷、三江平原等地。而农民工的源头，则主要是四川、河南、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他们不但承担了许多脏活、苦活、累活以及有毒、有害、有危险的工程，而且在务工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技术和管理素质，学到了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本领，吸收了大量信息。外出的农民工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回乡后许多也都成了家乡发展商品经济、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1989年，通过治理整顿，进城的农民工重新返回农村和由于乡镇企业关停并转重新务农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800万~900万人。现在，虽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潮回流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需要明确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大方向是



不会也不可能逆转的。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治理整顿目标的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将继续向外转移。不言而喻，今后必须加强对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计划指导，建立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劳动力流动新秩序。

第三节 用改革精神实现农村社区整合

农村社区整合就是要组织、协调农村社区内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要素、力量、机构，使社区政治、经济、文化有序地向前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按照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事物发展规律，经过努力和采取必要措施使不平衡达到平衡，从而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没有整合，就没有平衡、有序、稳定，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平衡、有序、稳定又只能是相对的。这就决定了整合不是一时的任务，而是农村工作中的一项经常任务。在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农村社区整合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农村改革，特别是以家庭作为生产经营基本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打破了我国农村社区的原有均衡，引起了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动，从而突出地提出了现阶段农村社区整合的任务。

随着农民家庭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了。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从过去完全听命于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被动生产者，变成了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过去是农民向生产队长要粮要钱，现在这种关系恰好倒了个。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是农村其他变动的基础，也是所以要提出农村社区整合任务的根本原因。目前，农村社会经济变动需要实施整合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农村改革的进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民由单一种粮发展为多种经营，并且逐步从事非农产业，农民职业和地域的变动，不仅引发了农村内部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而且对长期隔离的城乡关系也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调整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农村改革也打破了农村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私人所有制在内的所有制多样化格局。如何理解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怎样对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实施有效管理，处理好它们与公有经济的关系，发挥它们在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和安排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健全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近年来农村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正日益为商品经济所取代，过去农村经济单一由计划调节的局面已开始转变为既受计划调节又受市场调节的新局面。处理好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成了农村经济能否健全发展，城乡关系能否协调的一个关键。

第四，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变动，农村政治、经济和群众组织也日益多样化，特别是群众自己建立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组织日益增多。协调各类组织的关系，也成了社区整合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农村社区处于变动、分化中的因素、力量、组织进行整合，纠正近年来出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无序现象，可以有两种做法，或者是在坚持改革的方向下实现整合，构筑新的运行机制，或者是退回改革前的状态，重新恢复农村社区改革前的旧秩序。

在农村发展的进程中，改革打破了旧秩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某些无序乃至混乱现象，是必然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按照改革的精神进行整合，重新建立社区新的运行秩序，这样，农村社区发展才能日臻成熟和完善。



用改革精神实现社区整合，其中在坚持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整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两点前面已详加论述。此外，用改革精神实现社区整合，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要在坚持所有制多样化格局的基础上实行社区整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经济上就要坚持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要准确把握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1)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就全国范围或者从总体上来说的，在不同地区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的比重应该而且必然会有所差别。(2)公有制为主体，不仅要从数量上看，而且要看公有制经济是否包括了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即能够影响和制约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命脉。这样理解公有制为主体，就能在社区整合中，从本地实际出发，选择最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继续保持所有制多样化格局，并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是要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整合。近年来我国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是农村社会经济最深刻的变动之一。农民由按照计划指令推一推、动一动的人民公社的附属物，变为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这是我国农村事业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深刻的经济动因。但是，与此同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和突出。解决这一矛盾也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重新关闭市场，把农村经济再度置于大一统的计划指令之下。这种办法对我们是轻车熟路，但几十年的实践则表明，这样做必然会带来束缚乃至破坏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后果。当然也可以采用另一种办法，即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恰当结合起来，用符合经济规律要求，特别是价值规律要求的计划，指导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做，就能保证农村商品经济的有序发展，既可以继续调动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动性、积极性，



又可以适应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需要。

实现农村社区整合，还有必要对整合力量和整合手段作一些分析。

在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随着农村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和人际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一些村级的党、政组织，从过去“啥事都管”一下变成“不知管啥”，例行公事地守摊子，管管村务，催粮收款，结扎流产。在农村社会经济深刻变动的过程中，村级党政组织的社会职能反而严重萎缩，这与农村社区整合任务的需要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现在农村社区的整合力量，有党的组织、政权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现阶段，党的组织仍然是领导核心。党要领导和协调各类组织，以政权组织为后盾，以经济组织为依托，以群众组织为纽带，搞好社区组织的配套建设，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实现社区整合。

近年来，有些地方的基层组织，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处于软弱涣散甚至瘫痪半瘫痪状态，严重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损害了农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社区整合任务更无从谈起。为此，要加强对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组织专门力量，分期分批地进行整顿，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发挥它们在农村社区整合中的作用。

当前，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要按照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教育、引导、团结和组织农民，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农村社区就是一个“小社会”，只有建立起党支部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组织起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好各方面的工作，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一句话，才能有效地实现农村社区整合。

在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民成为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的



商品生产者的今天,农村社区的整合手段必须而且可能加以改变。过去,在人民公社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行政性的强制成为社区整合的唯一手段。虽然那时也有表面上的一致,但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压抑,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改革后的今天,在农村社区整合中,虽然行政手段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社区整合中民主手段和经济手段越来越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要求,要在党组织领导下逐步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推进农村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随着农村社会分工的发展,农村人际关系正在或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血缘关系、地缘关系逐渐被业缘关系所冲破。适应这种人际关系的变
化,只有由村民自己选举的人,才有可能对社区进行有效的管理。

在运用经济手段实现社区整合中,社会化服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化服务是通过农民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引导农民行为,实现社区整合的有效经济手段。要学习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既推动农业发展,又引导农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本领。关于社会服务体系的问题,前面已讲的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在农村改革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动,包括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农民职业的分化,农民地域的变迁,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以及各类经济和群众组织的涌现,都提出了在新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整合的任务。但是,实现社区整合必须以改革精神为指导,绝不能走回头路。可以断言,在深化农村改革的进程中,我国农村社区将更加焕发出蓬勃生机,以坚实的步伐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目的地。



第三章

农村经济发展形势与展望

第一节 农业形势的好转与困难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1984年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但1985年以后，我国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连续几年徘徊不前，在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从1988年下半年起，我国国民经济开始了治理整顿，全国上下重视农业，并采取了有效措施。1989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转机，1990年农业生产进一步获得了全面丰收。

1989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0755万吨，不仅超过了1988年的39740万吨，而且超过了1984年产量40731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1989年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回升，有助于缓和1985年以来粮食供求的紧张形势，有助于稳定国民经济，实现治理整顿、深化改



革的目标。1989年，粮食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开始结束，固然令人欣慰。但是，如果把粮食问题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来观察，并且联系农业内部结构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变动，那末，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盲目乐观。应该说，喜中仍然有忧，农业生产的严峻形势并未因1989年粮食产量的回升而根本改观。这是因为：(1)1989年粮食增产，52%是靠扩大播种面积。虽然粮食比1988年增长3.4%，但棉花却减产8.7%，油料减产2.2%，甘蔗减产27%。这就是说，粮食的增产是以棉、油、糖等主要经济作物的减产为代价的。(2)1989年的粮食产量为40755万吨，仅比1984年的40731万吨增加24万吨，而1984~1989年，我国人口净增长7315万人，因此1989年人均占有粮食比1984年减少25.5公斤。虽然近年来我国有些地区出现了卖粮难，但这只是由于交通条件、流通体制、资金供应以及仓储设施等方面的限制，在局部地区一时出现的情况。就我国全局看，粮食供求紧张的局面并未根本缓解；同时，从长远看，粮食紧张仍将是限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1990年，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普遍丰收。当年夏粮总产比1989年增长5.8%。秋粮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收打情况也普遍好于198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加2745万吨，达到3500万吨。值得一提的是，与1989年不同，1990年不仅粮食丰收，而且棉、油、糖等主要经济作物，预计也将获得丰收。从去年开始，我国农业生产出现转机，几年来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开始结束，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党和政府重新把农业摆在重要的基础地位，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和支持。(2)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农业“丰收计划”的实施。(3)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4)全国多数地区风调雨顺，气候条件较好。

判断农业形势，除了依据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情况，



还要考虑到：(1)农业基础设施的状况，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2)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包括农业生态环境状况。(3)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包括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农业再生产的宏观经济环境，其中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及其与工业品的比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上述三方面来观察，我国目前农业的发展形势依然是严峻的。

近年来，由于务农比较利益降低和农业投入的减少，农业生产条件在吃过去的“老本”，农业基础设施被进一步削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前6年，我国粮食连年增产，除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关键作用，是同多年积累的农田水利建设的老底起了作用，农机开发的深耕层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几个大化肥厂的相继投产，以及推广2亿多亩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分不开的。可是，近年来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忽视，甚至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分割、对立起来，似乎有了包产到户，其他农业生产条件都无所谓了。因此，农业生产设备、设施老化，损毁日益严重。从农业机械来看，1988年，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2658亿瓦特，其中44%使用年限在11年以上。1987年大中型拖拉机88.1万台，其中使用年限在10年以上的55.7万台，占63%。由于老化、失修，只能带病作业，效率低，耗油高，机耕面积只有43%。从水利设施来看，我国8.2万座大中小型水库，总库容量为4000亿立方，现在库容量的1/4以上已被泥沙淤积，病险库已达40%以上，机电排灌设备老化，有效灌溉面积减少。过去30年，国家每年水利投资几十亿元，平均每年增加灌溉面积1500至2000万亩，为每年增产55亿至60亿斤粮食提供了水利保证。但从1981年开始，大量削减水利投资，从70年代占基建投资的7.19%降低到80年代的2%左右。从化肥使用情况看，1984年施肥1740万吨（有效成分），比1978年增加近一倍，平均每年增加143万吨。而1984~1988年每年只增加100万吨。化肥总实物量维持在1亿吨左



右，增长缓慢，与此同时农家肥却大量减少。从农业服务体系看，目前全国有1/3的乡和1/2的村没有健全的农业服务体系，农业技术基础十分薄弱。

我国农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也需要高度重视。(1)水土流失面积继续增加。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5%。每年因洪水、沙化等灾害损毁的耕地约有200万亩。(2)由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占用耕地失控，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过多，以及耕地的自然损毁，近十年来耕地减少5500万亩，而且减少的多为优质耕地。(3)耕地质量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水土流失，有机肥使用量减少，我国中低产田已占耕地面积的80%，耕地有机质含量已降1%左右。(4)我国森林资源危机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虽然近几年植树造林面积略有增加，但木材资源年消耗量已从第一次清查(1973~1976年)的1.96亿立方米和第二次清查(1977~1981年)的2.94亿立方米，增加到第三次清查(1984~1988年)的3.44亿立方米，消耗量赤字已达9700万立方米。按目前消耗水平推算，可采伐的成熟林和过熟林只能维持七、八年，木材生产面临断档的危险。(5)草原状况不断恶化。我国可利用草场为43亿亩，退化、沙化、碱化面积已达30%左右，产草量大为下降。(6)近海渔业资源趋于衰竭，内陆水面污染日益严重。遭受污染的农田已达1亿亩，江河湖泊受到污染的达到80%左右。

此外，我国一些年来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包括农产品价格水平和与其他产品的比价，农业投入，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也有恶化的趋势。有关情况，拟在下一个问题中再作分析。

综上所述，虽然1989年和1990年我国农业生产出现了转机，但如果对农业形势作一全面和深层次的分析，对现阶段的农业形势绝不能盲目乐观，否则又会重蹈1985年以后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之路。



第二节 1985年以后农业 徘徊数年的教训

1985~1988年，我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农业政策的失误，包括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投入方面的失误，归根到底，是在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基本方针方面出现了偏差。

一、关于农产品价格

改革农产品价格体系和流通体制，放开一些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对畜产品、水产品、水果的产量迅速提高起了推动作用。但是，价格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虽然名义上改为合同定购，而实质上通过行政手段、按低价强制收购农产品这一统派购制度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同时，对粮、棉、油等产品的收购价尽管有所提高，但是农用生产资料等工业品的价格上涨幅度更高，农产品成本上升超过了收购价格提高所增加的收入，因而农民务农，特别是从事粮、棉、油生产的积极性下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1984年粮食空前丰收的条件下，政府商业部门向市场倾销100亿斤粮食，导致市场粮价一跌再跌。所以这样做，固然有受资金、仓库等条件限制的原因，但也由于主观上认为当时粮食过多，想通过抛售粮食、降低粮价，支持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以实现缩减粮食播种面积，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目标。同时，从1985年开始对粮食收购价也作了调整，由原来超购加价改为“倒三七”比例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这对一些享有较多超购加价优惠的新产粮区实际上是降低了粮食收购价格。这样，无论是粮食市场价格，还是粮食收购价



信号，还采取了限制粮食播种面积的行政措施。双管齐下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交织作用的结果，导致粮食播种面积的剧减，由1984年的169326万亩减少到1985年的163268万亩，减少6058万亩。

除了粮食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粮食与其它产品的比价关系不合理的问题，包括粮食与工业品的比价，以及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比价不合理，也导致了粮食生产徘徊不前。近年来，虽然粮食收购价格在提高，但赶不上工业品，特别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因而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益减少，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1984年农业成本占收入比重的29.6%，1987年上升到48.6%。粮食与日用工业品的比价差也越拉越大，1985年与1980年相比，火柴涨价30%，肥皂涨价15%，而水稻价格仅上涨4.5%。在农业内部，农产品之间比价不合理，也是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广东省在1988年率先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每50公斤稻谷收购价由19.16元提高到25元，提高30%，但仍未根本改变农产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状况。在广东省东莞市，按每亩净产值计算，稻谷214.41元，甘蔗673.19元，橙柑3739.9元。在广东省顺德县，从1962年到1988年，农产品比价关系变化如下：稻谷与甘蔗由1:0.14变为1:0.19，稻谷与塘鱼由1:4.56变为1:9.36，稻谷与毛猪由1:6.33变为1:11.72。由于农产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种粮比较利益低，广东全省粮食播种面积比1978年减少1000多万亩，从外省调入的粮食数额不断上升。

二、关于农业投入

农业徘徊不前，也同前几年农业投入，包括资金和物资投入减少密切相关。

在中国实行以农户为基础生产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户家庭已取代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业投资的主体。现在，对农业的投资仍然是多渠道的，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近年来，



格，都给了农民收缩粮食生产，调整资源投向的信号。除了价格无论那一条渠道上的农业投资，都出现了减少的趋势。

先看国家的投资。国家投资对农业发展历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商品基地的建设，大面积中低产田的改造，化肥、农药等大项农用工业的建设，重点科研项目的开发和推广，这些都不是农民个人力所能及的，而必须国家的财力支持。可是近年来，特别是1985年以后，国家经济政策过于向工业倾斜，因而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近年来已降低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解放后30年，这一比例一般都保持在10%左右，可是1980年以后则直线下降，从1980年占9.3%下降到1988年仅占3%。同时，国家对农用工业的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的比例也在降低，由过去30年平均4.2%下降到1978~1988年的1%左右。此外，农业信贷资金的规模也偏低。不仅中央政府对农业投入在减少，而且地方政府这些年来在财政包干体制下，虽有了一定的投资能力，但为了增加地方收入，投资取向也向比较利益高于农业的工业部门倾斜，从而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把农业投资缺口留给中央。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集体提留减少，投资能力降低。农村集体提留占纯收入的比重，1978年为16.7%，以后逐年下降，1988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达10.2%。农村集体投资虽然由1983年的111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457亿元，增加3.1倍，但用于农业的比重却由1983年的30.1%下降为1988年的9.4%。的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郊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很强，因而在向农业投入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全国不少地区，主要是一些偏远地区、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年来集体经济实力有所削弱，乡镇企业尚未充分发展，因而集体经济这一层次向农业投入的经济实力很弱，不能很好地履行支农、建农的功能。



至于谈到现阶段作为农业投入主体的农民，由于务农特别是种粮比较利益的低下，以及落后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他们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不高，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活性消费，甚至愚昧性消费。从1978~1988年，农民的纯收入增加了3.1倍，而同期建房投资额增加了约20倍，从1978年的近30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610多亿元。1988年农民用于家庭经营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26.4%，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比重为3.4%，比1983年的5.7%下降了2.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用于生产的那部分投入，在产业选择上，由于从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比较和利益大大高于农业，也主要向农村二、三产业倾斜。

国家、集体和个人对农业投入的减少，使近年来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恶化，有效灌溉面积减少，机电排灌设备老化，许多水利设施失修，甚至遭到破坏。目前机耕面积只有43%，20%以上的农业机械已超期服役。1978~1984年平均每年增加施肥143万吨（有效成份），而1984~1988年每年只增加100万吨。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这种十分薄弱的状况，是农业后劲不足重要原因。

三、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几十年来，我们党一直强调农业问题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极端重要的问题，农业的稳定增长是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但是，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历程，真正坚持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针，特别是在农业发展比较顺利、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仍能一如既往实施这一方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50年代关于“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争，到80年代对我国经济政策存在的“城市偏向”、“城市倾斜”的批评，争论的实质都是围绕着到底把农业摆在什么地位这样一个中心。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所出现的大起大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农业发展战略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某些偏颇分不开的。

近年来，特别是在1984年农业大丰收之后，在经济工作指导



思想上出现了忽视和削弱农业基础地位的偏差。在财政、投资、信贷、物资等方面统统向工业和城市建设倾斜，使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建国后最初30年，我国工农业增长比例在2.8:1左右；1979~1984年为1.5:1；而1985~1987年提高到4:1；1988年进一步扩大到6.7:1。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农业的承受能力。1988年工农业增长的相关比例，远远超过了我国现阶段工农业增长应大体保持2:1的正常经验比例。

几十年来，在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方针的过程中，似乎存在这样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农业形势好时就开始忽视农业，等到农业发生了困难，农产品供应紧张，影响和制约了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时候，才又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这种反复已有几次。经验表明，虽然我们讲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已经多年，但是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倾向并未真正转变过来。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治理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我们支付的“学费”已经不少了，但愿今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反复。

第三节 粮食再上新台阶的对策

首先要明确一点，解决我国11亿人口的粮食问题，主要不能依赖进口，而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在这里，不用说我国不能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在政治上受制于人的理由，即使从经济上来看，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想主要靠世界市场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也是不现实的。由于多种原因，世界人均粮食占有数自1984年以来已急剧下降14%，1989年收获前世界粮食储备不足2.40亿吨，仅够供应世界人口54天的需求，在1988~1989年度，世界粮食需求将超过供给1.52亿吨。1990年度，世界谷物的库存量只有2.97



亿吨，刚达到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库存量占全年消费量 17—18% 的最低安全水平。

要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需要从生产、流通以及粮食后生产系统和消费几个环节一起采取措施，不言而喻，主攻战场当然在生产环节。

一、生产方面的对策

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现在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体只能保证生产粮食 4 亿吨、棉花 400 万吨，因而粮食要上新台阶，必须增加投入。作为投入的物资形态，每形成 5000 万吨粮食的增产能力，大约需要投入化肥 1500 万吨，农机动力 367.75 亿瓦特，电 100 亿千瓦小时，柴油 130 万吨。作为投入的资金形态，一般说资金存量每增加 1%，粮食产量可增加 0.414%，换句话说，如果粮食产量要增加 1%，资金存量就必须增加 2.4%。

国家对农业要舍得花钱，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真正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同时还要对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相应改革。例如，要研究投资向城市、向工业倾斜的体制原因，以及解决对策，研究如何调整和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以调动地方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研究如何改革金融管理体制以解决发放贷款中的“嫌贫(农业)爱富(工业)”问题，等等。

党中央提出的既要抓好常规农业，又要抓好开发农业的方针，对于粮食迈上新台阶是极其重要的。为了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一方面需要对业已开发利用的农业资源，通过物质技术投入，实行集约经营，千方百计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另一方面，又要十分重视对潜在农业资源的有计划开发利用，为我国人民开创新的生产条件。我国发展开发农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包括：可供改造的约占 2/3 现有耕地面积的中低产田，以及可供逐步开发利用的宜农荒地 5 亿亩、荒山草坡 40 多亿亩、淡水水面 8500 万亩和沿海滩



涂3000万亩。

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粮食迈上新台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概括说来，可以从两方面采取措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微观方面，要稳定和完善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宏观方面，还必须坚持和深化价格改革。在农业业已成为农业投入主体的今天，没有比较利益关系的调整，无论是增加农民个人的投入，还是增加集体经济层次的投入都是困难的，即使一时增加，也难以持久。看来，这方面大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继续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逐步缩小合同收购价、议价和市价的距离。（2）通过农业生产资料专营的实施，在继续增加农用生产资料供应量的同时，抑制其价格的过高过快增长。（3）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要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提高价格的时机选择和幅度确定，需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并与治理整顿的有关措施相衔接和协调。

二、流通方面的对策

生产决定流通，反过来流通也影响生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决定生产。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于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总体上看，我国粮食的供应不能满足需求，但是在局部地区又存在卖粮难的问题。粮食全局紧缺与局部卖难同时存在，主要是由于流通方面的原因所致，包括资金紧缺和仓储困难。

关于资金紧缺。从1985年以来，农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问题，特别从1988年开始，收购农产品中给农民“打白条”的现象日益严重。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三令五申不许给农民“打白条”，可是迄今为止，“白条”现象并未根除。农产品收购资金供应，涉及财政、银行、商业等部门，现在各个部门都纷纷诉苦衷，把“白条”产生的责任推给其他部门。银行和商业部门反映，近年来财政部门拖欠应付商业粮食亏损和应拨政策性补贴现象很严重，因而使大量银行贷款用去填补财政资金不足，“白条”出现与此有很大关



系。而财政部门对此则发表了不同看法，声称他们拨付的收购粮食加价款是足够的，并且指责粮食经营加工企业经营不善，甚至违反财政纪律把铺张浪费等开销统统打入财政亏损之内要求补贴，同时这几年银行和商业部门占压财政利税的现象也很普遍。中央银行说为力争不“打白条”已增加给农业银行的贷款，而农业银行则仍为收购资金的硬需求和软供给的矛盾所困扰，由于贷款超过存款已是负债经营。商业部门抱怨银行供给的资金不足，而银行又责怪商业部门资金挪作他用，贷款数额居高不下，连自有资金也靠银行解决。此外，农产品收购在农村，加工在城里，相互拖欠的情况也很严重。可见，目前收购资金紧缺，“白条”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而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务必综合治理，理顺财政、银行、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理顺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专业银行与专业银行以及专业银行内部的关系，解决由于部门利益关系所形成的你欠我、我欠他、他欠我的三角拖欠关系。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只有从体制着手，深入进行改革，调整、协调各个部门的利益关系，统一到齐心协力把农业搞上去这一目标上来。

关于仓储困难。这也是卖粮食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商业部披露，目前全国有60000个存粮库，面积8200多万平方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建国前和50年代建的，需要修理和待报废的，占现有仓容面积的15%。目前，粮库可存粮油700亿公斤，但远不能满足粮食储存的需要。近几年，每年有200亿~300亿公斤粮食在露天存放。国家贮粮难必然带来农民卖粮难。为了适应粮食生产发展和国家收粮、贮粮的需要，今后应把粮库建设纳入基本建设计划，主要以地方增加粮库建设为主。中央和地方粮食主管部门要集中管理粮食简易建筑费，重点解决仓容不足和仓储设施配套问题。为保证仓库的更新和维修，可适当提高粮食折旧率和大修理基金的提取标准。还可以考虑从议价粮油的销售额中提取一



部分用作建仓的费用。

现在，在有些地方由于资金短缺和仓储困难，粮食收购站纷纷关上大门，把肩挑车拉向国家交售余粮的农民拒之门外。粮食按正常渠道卖不出，投机倒把的粮贩子便乘虚而入，压低粮价，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同时卖粮难不仅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挫伤了粮食调出地区的积极性。生产、征购、储存、外调粮食越多，因而对国家贡献越大的地区，按理说从政策上本应得到的鼓励和实惠也应当越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是谁产粮、谁存粮，谁吃亏，粮食储存费用一律由调出地区承担，不仅占用资金，而且要支付贷款利息。1988年9月后国家又提高了征购粮的贷款利率，这部分增加的负担也落在了粮食调出地的身上。甚至粮食议转平的差价部分也要由粮食调出地承担，出现粮食调入地吃粮食调出地补贴的不合理情况。按现行政策，调出每100公斤粮食，调出地虽可收取7.4元的调拨经营费，但根本抵偿不了利息和仓储保管费用。例如，全国粮食生产基地之一的山东省文登市，1988年粮食储存总耗费722万元，而收取的调拨经营费只有216万元，亏损506万元。这样的政策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经常说，“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可是我们的一些具体政策往往与此背道而驰，不是支持农业，鼓励多打粮食，而是抑制粮食生产，损害粮食生产者和粮食生产地区的利益。现在，是从根本上检讨和调整有关粮食产销政策的时候了。

三、粮食后生产系统和消费方面的对策

解决粮食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产前和产中环节，粮食后生产系统或者说粮食产后处理也是一个亟待重视的领域，处理好其现存的问题，减少在这一过程中的粮食损耗，对于缓解我国粮食供需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粮食产后过程，包括收获、脱粒、干燥、运输、加工和销售等一系列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分散性、非商品性和粗



放性。现在，我国75%的粮食靠农户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分散加工和储藏；储藏的目的主要是自给；加工手段基本靠人力和自然能；95%的粮食靠人工收获；98%的粮食靠日晒干燥；脱粒和碾米设施也十分落后。因此，每年收获的粮食由于鼠害、霉变、虫害以及各种机械原因造成了很大损失。据浙江省农产品产后技术开发中心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浙江省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至少达25万公斤，粮食损失率约为10%至25%。若按损失率15%和总产量4亿吨估算，我国每年约有6000万吨粮食得而复失。因此，迫切需要增强粮食后生产系统的技术装备并提高管理水平。现在是农业部门抓生产，商业部门管销售，粮食生产后处理成了“两不管”的薄弱环节。今后，应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粮食生产全过程的管理，使产供销成为一体。同时，要尽快采取相应措施，改变我国粮食产后加工技术的落后局面，包括通过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广高效收割和脱粒机械，推广简易干燥设备和技术，以及改造贮粮设施，推广木柜、水泥仓等以利粮食的集中贮藏。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一直徘徊不前，而对粮食的需求却连年飞速增长。1978年至1988年，我国粮食产量由30477万吨增加到39408万吨，平均年递增2.6%。而同期粮食社会消费量则由25199万吨(贸易粮)，增加到35652万吨(贸易粮)，年递增3.5%，高于生产量增长幅度。工业用粮年递增更高达11.4%，远远超过粮食生产的增长幅度。粮食供需失衡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高，粮食消费膨胀特别是肉类、酒类耗粮过猛，以及消费中对粮食的大量浪费。因此，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逐步做到粮食的合理消费，节约用粮，实现我国粮食的供需平衡。

我国现在的粮食购销价格严重扭曲，购销价格倒挂，全国统销粮750亿公斤，每公斤国家补贴0.322元，共计补贴241.5亿元。这不仅成为国家的沉重财政负担，而且无助于鼓励粮食生产，相反成为助长粮食浪费的重要经济根源。今后需要增加粮食生产性价



格补贴，减少粮食消费性价格补贴。看来这是粮食价格改革的方向，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采取慎重和稳妥的态度，特别注意不要给社会安定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我国粮食增产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每年用作饲料的粮食达800亿公斤，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5，其中仅肉猪消耗的粮食就达600亿公斤以上。为了减轻我国饲料的沉重负担，今后除大力发展草食牲畜，在饲料加工工业中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减少粮食的消耗，是大有可为的。

此外，抑制工业用粮过猛增长的势头，也是当务之急，除了在价格方面对工业用粮需要采取控制措施，还迫切需要对一些用粮行业的管理和整顿。尽管从1989年开始，政府三令五申要限制白酒生产，但在高利润、高税收的诱导下，“发酒疯”的现象仍越演越烈。全国白酒总产量1988年就已高达431万吨，一马当先超过了国家规定的2000年的规划目标。今后再也不能让“发酒疯”的现象继续蔓延下去了。要制定适应商品经济形势的新的酒类专卖制度和专卖政策，加强行业管理，改变目前多头管理放任自流的情况，同时要通过财政体制改革，使开办酒厂的地方没有那么多的利税可得，用“釜底抽薪”法来控制“发酒疯”。

总之，只要我们从生产、流通以及粮食后生产系统和消费诸环节采取措施，既鼓励生产，又抑制浪费，我们完全有信心走出目前粮食供求紧张的困境，使我国长期存在的粮食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第 五 编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与中国的现代化



第一章

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第一节 社会生产力的概念与内涵

物质生产力在人类社会中经历过两个发展阶段，这就是：

(1) 自然生产力阶段。自然生产力是以自然形成的自然生产条件或自然形成的生产因素为基础，同自然的劳动力相结合产生的生产力。它的成果是自然物。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的主体和客体条件不是人类社会生产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①产品只能补偿自然条件和人本身自然力的消耗。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的一个历史阶段。(2) 社会生产力阶段。社会生产力是以社会发展起来的生产条件或生产因素为基础所形成的物质生产力。它的主体和客体条件都是人类社会分工协作、科技进步和历史积累

^①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



起来的产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大量剩余产品，它是人类社会已具较高的改造自然能力的一个历史阶段。

对生产力的考察，不是着眼于自然生产力（即自然力+劳动）而是着眼于社会生产力（即生产资料+劳动力）。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力，其任务在于探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进行合理组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因此，生产力理论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力就是社会生产力。它表现为出现社会分工协作之后的人对自然的关系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根据传统说法，它是回答“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问题”^①，因而，“生产物质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合起来，便构成成为社会底生产力”^②。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更认为生产力不仅是人们征服自然的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关系，而且是人们调节自然、改善自然的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关系；不仅是人与工具两因素的总合，而且是劳动者人的因素与生产资料物的因素（这些组合为生产力的实体性功能）及一切被人们用来生产产品的物质手段、物质条件、自然对象，即一切被投入生产之中的能量在运动中的结合，它包括由科学技术、教育、知识组成的生产力的渗透性功能，由分工协作和管理组合成的生产力的运转性功能，以及由人与生产资料组合成的实体性功能。这些功能构成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有在数量上结合，表现为各个因素，各种功能的集聚程度的规模状况问题；有在质态上结合，表现为各个组合单元之间合理构造的状况问题；有在时间上结合，表现为各因素、各种功能的序列衔接的时序状况问题；有在空间上结合，表现为各个因素、各种功能的地区分布的布局状况问题。规模、结构、时序、布局，是生

①② 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155、152页。



产力存在与发展的一般形式。

第二节 社会生产力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地位

生产力这一科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占有什么重要地位呢？

第一，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一切经济现象，经济关系时首先要进行考察的。如列宁强调的那样，“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①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的最活跃，最革命的物质内容，是决定生产关系的東西。生产方式的变化总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因此，我们考察任何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时，总是首先考察物质内容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劳动资料中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情况。“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②它是划分社会经济时期的尺度和标志。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人们才能进一步去考察由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进而再进一步去考察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我们确定自己发展战略和路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必须把握的出发点。我国的生产力现状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居于世界后列，11亿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在用手工工具搞饭吃；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工业和手工业，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占人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4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



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正是生产力落后的这种客观实际，决定了我国今天仍然没有超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这一初级阶段至少还将持续到下个世纪的中叶。由此决定了我们必须执行这样的指导方针：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必须坚持全面的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必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第二，生产力本身具有独立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外的构成因素、内在矛盾、存在形式和发展规律。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下发展的，它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单独存在。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但是，解决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并不等于生产力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发展。这是因为：（1）生产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由许多因素和层次组合成的巨系统，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不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所能代替的；（2）生产力由于其自身的内部矛盾运动，它有自身的发展动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归根结底，也要通过生产力内部矛盾和运动规律来发挥作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结合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①。因此，即使是解决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问题，但如不按生产力本身的运动规律办事，社会生产仍不可能取得顺利发展。这是我们过去的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了的。大力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基本要素，构成层次、结合方式及其运动规律，对我们来说，具有巨大的迫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89页。



第三，把生产力搞上去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从事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为全体劳动者谋利益的党。为了改善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我们改造世界的总目标，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标准就是看它对生产力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是起消极的破坏作用。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马克思主义强调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在于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关系，更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论断社会主义必将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已占人口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论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能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关键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做到：（1）不能因为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就不去夺取政权^②；（2）不能因为掌握了政权，就不去发展生产力。一旦夺取了政权，就要借助于政权和“这种文明的前提”去迅速发展生产力，赶上发达国家^③。但是，长期以来，假马克思主义把列宁这一完整的思想歪曲为只讲革命，不谈发展社会生产力，甚至还要把讲发展生产力的，当作“唯生产力论”来批判。我们党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以后，没有始终紧紧地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大目标，把党的工作及时地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以致十多年的左倾和文革动乱，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国民经济发展迟缓，带来了大量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历史经验向我们指明，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80页。

② 列宁：《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第561页。

③ 列宁：《论俄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728页。



当我们解决了革命问题以后，凡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首先热衷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热心于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不断加强。它既是摆脱贫困，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唯一出路，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途径。

因此，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尽管我们已具备了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本质特征，但由于我们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说还不够发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不雄厚，因而还谈不上“完全”或“完备”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那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①

总之，离开社会生产力的标准抽象地讲社会主义，就难免导致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而这一点，正是一切“左”的东西得以存在的症结所在。

第四，发展生产力，实现我国雄伟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部署，大体上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完成现代化。为了实现战略的总目标，当前必须把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必须搞好经济体制和政

^① 邓小平1987年4月同外宾的一次谈话。转引自《人民日报》1987年8月17日第5版。



治体制的改革；此外还要解决好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等关系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实质上都是合理组织生产力的问题，讲求生产力经济效益的问题、解决生产力发展的外在环境问题、发挥生产力系统功能的问题。

第三节 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马克思奠定了科学生产力理论的基石

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科学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状况及其发展阶段，是社会经济关系或财产关系变革和阶级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终极原因。他指出，判断一个变革时代，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这就唯物辩证地阐明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

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生产力论，而且还揭示了生产力是一个系统的思想。首先，他指出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要素组合生产的过程，同时还指出决定劳动生产力的“有多种情况和多种因素”。^②生产力是这多种情况总体作用的结果，它表现为现实的，既得的劳动生产力及其水平，从而给生产力范畴以科学的内含。其次，马克思还研究了生产力诸因素在发展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3页。



的层次性、阶段性、动态性和平衡性问题。例如，他指明三大实体要素应属第一个层次，科学发展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属第二个层次，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分工协作等)是第三个层次。提出生产力要素在各部门的发展上要在结构上相适应、量上相配比的协调发展问题，从而揭示了生产力内部诸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再次，马克思还分析了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因素对生产发展的影响和反作用，这实际上是建立了生产力系统论的环境论。

二、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的生产力理论在一百多年后的新中国有了新的发展。我国理论界早在50年代末就开展了对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内部矛盾和发展动力、生产力能不能自行增殖、生产力的运动规律、生产力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等一系列新问题的讨论。60年代，有的学者提出了建立生产力经济学的倡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重视对生产力问题的研究，使生产力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的新贡献。现将生产力经济理论的新进展扼要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源泉。生产力发展的动因、源泉在哪里？是生产关系这一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适应性？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抑或是生产力自身的内部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认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因”，不在于它同外部的联系，而在于其内部矛盾性：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矛盾(表现为生产力实体中人与物的因素必须在质上和量上，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适应，否则生产力整体的发展失掉均衡而受到破坏，从而速度延缓。)；生产资料的内部的矛盾，(表现为劳动资料和劳动



对象的结合是否协调)；“人”的因素的内部矛盾(表现为人员类型、人员结构、人员素质不适应，比例不协调)；生产力实体层与非实体层次之间的内部矛盾(表现为“硬”与“软”不协调，科技与教育要素落后于固定资产投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等等)。这里，生产力内部矛盾的正确调整和处理，是制约生产力整体功能的直接条件。因此，这一论述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转变了一说要发展生产力就力图先变革生产关系(包括与其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传统观念。

第二，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对生产力起推动或阻碍的作用。这里，除了经济关系的利益调整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成为生产力能否充分发展的关键以外，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并不一定都是以“间接”的“折光”来反映的。它可以表现为三种作用形式。一是上层建筑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折光”式间接的反映联系；二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力之间的“辐射”式直接的反映关系；三是上层建筑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的直接联系关系。这些相互作用的联系形式，突破了斯大林上层建筑与生产力间接联系论在长时间里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揭示了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澄清了认识论上一大偏差。

第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结合在一起的系列“合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是某一部分动力的孤立“启动”，而是下述诸种动力的联合(循着一个共同方向)而成的“合力”：(1) 生产力内部各要素间的矛盾——“内动力”、“原动力”；(2) 生产力发展的外框架——经济关系的适应程度，它是追求利益而产生的“内驱力”；(3) 通过“折光”、“辐射”、“保障”而作用的“精神动力”。只有“内动力”、“内驱力”、“精神动力”等相协调，而不是相摩擦、互



相抵消，生产力才能快速发展。

第四，关于生产力内涵和生产力是一个“系统”。生产力是一个开放的，随着时代不断变动着的系统。它由如下的要素和子系统组成：（1）主实体要素——劳动者；（2）客实体要素——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3）渗透性要素——科学技术；（4）媒介性要素——职前教育和职业（专业）教育；（5）输导性要素——信息和信息网络；（6）运营性要素——管理（微观和宏观）。这一开阔的和深化的视野，突破了所谓的“人加生产工具”的原始生产力观，认识到生产力不是一个在平面上个数的相加，反映出内部诸要素（子系统）结构上的立体性、层次性和相关性。

第五，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社会重要的产业，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一个组成因素，也是一种精神生产力。所谓经济竞争实质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它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在于：（1）提供生产理论的新思维和规律性的认识，为生产提供新的可行手段；（2）通过转化为新的技术，应用于生产，产生“技术推力”和“需求引力”，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启动枢纽；（3）制约着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从而制约着经济发展的速度；（4）使经济管理成为一门科学，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5）不仅创造良好的经济效果，也创造巨大的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6）提供的信息，可以成为生产发展的重要资源，带来经济上的“加速度”。总之，科学是生产的“先导”，而且转化成为生产技术的速度日益加快，创造的经济效益也愈来愈高。

第六，教育是生产力的主导要素。教育具有多重属性，它既有上层建筑的一面，又有生产力的一面。只看一面，是一种片面性。教育、特别是职业（专业）教育和培训，作为一产出的部门看，它具有三个主要功能：（1）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部门；它使人口从生产力的“载体”变为“准生产力”、再变成现实生产力的“主实体”；（2）是科技知识继承和传播的基本手段；（3）是变知识形



态生产力为物质生产力的媒介。总之，教育关系着人的素质，创造精神、能力、文化和智慧，是决定生产发展最具战略意义的资源和部门，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七，关于生产力系统内部诸要素(子系统)的组合方式。生产力不是内部各部分的简单加总，而是在质态、量态、空间态、时间态上的有序集合，从而在系统内部呈现为结构上的整体适应性、规模上的比例适度性、布局上的集散合理性，时序上的衔接紧密性。这种深入到生产力内部考察其内在矛盾与优化途径，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打破了传统性对生产力的研究滞留于因素集散的狭隘眼界，别开了新生面。这不仅使人们对生产力构成及其组合优化规律提供了思路，而且使生产力理论体系更具丰富的研究内容，有利于指导人们在建设的实践中更加科学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其内在的整体优化效益。

第八，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尽管探索还有待于深化，研究还不够成熟，但取得较大共识的是如下一些基本规律：

——生产力发展不断趋向智能化的规律。它揭示了以实体中的人(劳动者)和以“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为主导的内部诸要素间的本质联系，是生产力诸规律的重心所在。其含义是：从主实体因素的变化看，体力因素渐趋下降，智力因素日益提高；传统的经验成规作用渐趋下降，现代科技的技术与操作作用日益上升。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看，劳动者的功能不断地对象化和生产工具的属性不断地劳动功能化；控制机在机器系统中作用日益突出。^①

——生产力系统诸要素(子系统)组合方式发展变化的规律。它揭示了各要素在质态上分工不断深化、产业部门有序成长、产业结构日益优化的发展趋向；在量态上，大型规模与小型规模要

^① 参见《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第4卷，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第15页。



以经济效益的高低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在空间组合上，生产力诸要素按优化指向分布的发展趋势；在时序组合上，生产力诸要素进驻和驻留在时间上更加有序和严密的发展趋势。

——生产力和环境日益结合为一个整体(系统)并交互作用的规律。它的含义是：生产力诸要素和自然环境(生态)必须均衡和协调发展的关系与趋势；和生产关系、经济条件结成紧密的反馈调节的发展趋势；和上层建筑、人口状况共同协调发展的趋势。

第九，生产力与周围环境双向反馈中，正负效应并存，正反作用交错。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是生产力系统变动的外因，它是分析生产力系统发展规律并予以合理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力内部各要素在组合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以与自然环境关系为例，变革自然的合理开发，可以造福人类，而野蛮的开发(短期行为)则导致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因此，生产力与各种环境都不是单向的一种效应，而是双向的正负效应并存。这一认识的深化，有助于人们在变革环境过程中，正确处理生产力系统的内外关系，科学地约束自己的有害行为，建立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制衡关系。

其次，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一双向来看，毫无疑问，生产力的作用是原始的和决定性的。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并非无足轻重，甚至某种条件下还可以起特殊的关键性作用。因而它们之间，决不是单纯的机械的“决定”和机械的“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着的两个方面。这里，生产力是革命的最活跃因素，生产力诸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要素自身素质的改善，必然引发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定的改变，是生产力决定和最终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衡量社会经济形态的进步，最高和最终标准是生产力。我们必须坚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的根本准绳。



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但是强调生产力这个决定性作用决不能忽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相应地反作用。孤立地强调发展生产力，不要四项基本原则，搞乱经济社会的安定，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预期的发展。同时，无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只讲四项基本原则，而不顾经济、政治方面必要的开放和深化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四项原则也就不可能坚持得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得到显示。

最后，关于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生产力标准，是指以生产力的发展与否作准绳，衡量社会进步并检验人们的认识与实践。它是评价工作与进步的最高尺度，从而可以科学地评价社会制度、文化制度、各种体制是否合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制约着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它的最终决定者的地位，使它成为检验历史进步的最高准绳。

生产力标准的“自我”尺度表现为：

——“主”实体，即人的素质及其能力的提高程度；

——“客”实体，即生产资料的功能化程度及其构成；

——非实体诸因素，即科技、职业教育和管理的水平和发展速度；信息的传递功能与效果，等等。

——效益的量化和优化，包括社会物质产品的总量和构成、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

生产力标准不是低层次的各部门具体工作的直接标准，不能给以庸俗化的误解，例如理解为“赚钱标准”、“盈利就是标准”。

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生产力标准同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关系？“谁是更基本的？”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原则，它并不是同生产力标准相平行的层次，它应当服务和服从于最终标准。然而层次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对立的。在当代的中国，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维护和保证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否则，社会就会出现大动乱，生产力也就失去了获得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要坚持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目的。当然，四项基本原则也不应该脱离生产力的检验。因为离开生产力标准的检验，也就划不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和“贫穷社会主义”的不同界限以及两者的根本对立。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我们应当勇于在生产力标准的检验中，在实践的发展中，使四项基本原则更加完善、充实、永驻青春。



第二章

生产力系统的基本特征

社会生产力不仅有其组成的因素，而且有其复杂的内部联系的结构，它不是因素的加总，而是依其关联结构和组合的是否合理，其功能有可能大于(或小于)分体之和。逻辑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我们首先从前面因素论的分解分析，进到系统论的综合考察。

那么，什么是生产力系统？它具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生产力系统是为实现某一功能而组合起来的总体。

生产力系统是经过人工调控集合人的智力，体力、物质、能量、信息于一体，具有输入(投入)与输出(产出)功能并协同动作的总体。不经过组织集合在一起，不可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那只能是自然力或潜在的生产力。不通过输入和输出人力，物质，能量，信息(经过调控、加工、检测)使产出多于投入，那只能是内耗力，而非生产力。只能是下降的生产力而非发展的生产力。

第二，生产力系统是囊括不同功能子系统组成的具有立体多层次性的总系统。



生产力系统，并不是各种组合因素在平面上的堆砌，并不是算数上的个量的加总，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含有各自功能的诸子系统的有机集合的系统。按照生产力系统的不同层次，可以分解为四项功能子系统，这就是：（1）实体型功能子系统，它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生产工具、配套辅助设施，检验仪器等）劳动对象（系统内的材料、能源、信息等）。三者构成为生产力的实体，是因为其它生产力因素都要附着在这三者的身上，或联结在三者之间并通过这三者的实体，来发挥自己的功能，是其他因素得以物化的物质承担者。（2）渗透型功能子系统。主要指科学技术、生产教育。这两因素都没有独立的实体形态，只能把自己的功能渗透在劳动者，（或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实体型因素身上，以发挥其提高和改善各实体本身的素质、性能和效率的功能作用。（3）纽带型功能子系统。主要指经济信息。它的交流与传递可以改善在质上相适应，在量上相匹配，在空间上分布合理，在时间上先后衔接，从而实现生产力在总体上的优化。（4）运筹型（或连接型）功能子系统。主要是生产的管理。通过它来统一组织、调度、处理、调控、选择等机制，改善系统内的条件与关系，消除内部矛盾，以保障系统内总体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

有的同志认为生产力系统中还应当包括一些保障型的功能子系统。例如生活资料中的粮食，生产运行中的资金，保障正常经济秩序的公安，检察和法院机关等等，它们都是生产力系统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一定妥当。不可或缺的因素不等于就是生产力因素。例如粮食，固然没有它就没有生产力实体之一的活劳动的存在。这确实是劳动力存在的条件。但是劳动者怎样才能生活，这应属于系统之外的第二位的问题，否则空气（氧）、水，岂不是也应该一一都列入了吗？显然，生产力因素应该和生产的条件有所区分。至于公安、检察、法院等不属于生产力，而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生产力以外的影响性因素，



把它罗列在生产力系统内，显然不当。

第三，生产力系统是开放性的系统。

生产力是组合的单元之间密切相关的开放性系统。从生产力内部看，构成生产力系统的各层次各子系统(各单元)之间小到作为生产力系统的一个细胞的微观工厂，大到作为生产力系统的国民经济宏观整体，无不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着的。在一个工厂企业中，劳动者接受一定的工艺技术知识培训(教育)驾驭着机器工具(劳动资料)，按照一定工艺流程和图纸(科学技术和和管理)，加工一定的原材料(劳动对象)，生产出某一特定产品(生产力要素和诸因素组合的总结果)，这里每一个侧面都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例如没有劳动者驾驭生产工具，其他生产力部分就不可能正常运转；没有一定的职业技术知识的培训，劳动者就难以掌握全部生产过程；没有一定的工艺图纸和生产流程，生产者就会失掉分工目标和生产的时间节奏，使劳动组织陷于混乱；没有原材料，就会失掉加工的物质承担者，就会变成“无米之炊”。不产出合乎规格的物质产品，生产力各个投入部分就都是无效益的浪费。就整个社会国民经济的宏观来看，也是为着实现某一产出目标。必须使生产力诸因素按照优化的需要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组织好质量、空间、时间的组合方式，消除内耗，克服矛盾。但是，这里微观的优化并不一定带来宏观整体优化。因此微观的优化必须从属于宏观整体的需要。

为了求得产出的较好效益，除了要搞好生产力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外，还要处理好生产力系统同外部环境的相互关联。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并同环境一起互相制约与互相影响。依照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辩证观点，环境的制约与影响是通过生产力自组织的内部才发生作用的，这种作用表现为生产力系统的“输入”，它主要有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波动和干扰这四个方而；生产力系统也必然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为生产力系统的“输出”，它主要有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和污染(排污)四个方面。为了求得系统内部与外界环境相适应，系统必须清除封闭自己的状态，并善于按照外界环境的变化信息调整自己。历史实践也证明一个工厂或一国国民经济，始终处于世界这个大环境系统的“吸引力场”和“辐射力场”的作用之中，不可能长久脱离环境系统的强烈影响和制约，孤立地得到发展。开放性系统之所以较之封闭性系统具有更大的生机与活力，是因为：一是开放性的系统具有综合外来影响，对外来因子给予选择、分析和吸纳的输入功能，使生产力系统自组织在吸收消化中吐故纳新，发挥优势。二是它具有把吸收能力再转化为输出的功能，给外界环境以辐射和影响，并促使自身在反馈中从旧的无序性向新的有序性转变。三是它具有弹性更大的自我调控功能，当环境因子发生作用时，既能淡化外来波动和干扰，又能吸纳有益的外来因素与影响，从而通过自我调控，使自组织更趋于完善和优化。由于开放系统能使内外之间频繁地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转换、传递，生产力系统的投入与产出反差比和调控弹性放大，促进了自组织的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能力，因而其张力，应变力、竞争力与活力也愈加旺盛。封闭式系统仅在界限以内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人员、商品之间的交流，结果禁锢与削弱了生产力系统自组织的功能的发挥，封闭了外界环境对自己的刺激和反馈，使得自组织的输入、输出、自我调控功能“板结化”，投入与产出的反差比缩小，原有的有序性迅速老化、僵化、弱化，混乱的无序性状态扩大，甚至同外界的有序性呈相反方向变动。总之，一个同外界发生物质、信息、能量相交换的生产力系统，如果不能适应外界总体的发展和变化，那它就不能稳定和发展。这样一种系统也就缺少甚至没有生机和活力。

正由于开放性生产力系统具有较强化的功能与活力，当代世界国土幅员最大，产业部门最完整、自己的经济技术最发达的国



家也无不强调发展自己和外界的经济技术关系。我国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如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封锁,或自外于世界……)搞闭关锁国,导致经济技术不发展,技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这一历史教训需要永远记取。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早日实现,我们必须坚持完全的开放。“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以及“十年规划”中要求对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实行技术改造,并新建一大批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重点工程项目,这样的大范围的建设规模,不靠开放的生产力发展战略,也是不行的。

第四,生产力是处在运动中的动态系统。

不断积累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同样,生产力系统,包括它的构成因素和组合方式,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过程。生产力系统这种运动的动态如何描绘呢?我们认为,任何系统的发展动态,都可以用反映它们的状态的一组值加以描绘。动态描绘一般都是指某一系统在输入外界的能量、物质、信息之后,通常都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可以用渐变过程中两个不同时点(期)的不同组值比较和确定同一系统在不同时期所起的变化。

这里,为说明生产力系统动态的描述,举一个常用的方法为例。^①：

两个时点的五维空间状态比较。不同的生产力系统,有不同的加工和处理对象,从而有各不相同的输出(产品)。例如冶炼厂的加工对象是矿石(物质),邮电系统的处理对象是信息,电力系统的处理对象则是能量,环保系统处理对象则是污染的水、物、气等有害物质。尽管不同系统处置的对象和输出物不尽一样,但归结起来最直接的共同目标,则是降低成本和追加投入,而为了

^① 参见任泽民、雷家驹、宋立康、雷友桂：《生产力系统的建立和控制》(生产力经济学会论文)



获得低成本、高产出，又必须保证产品要高产、优质，还要保障社会和生态效益，使公害最小。因此，一个优化系统的最佳运行标准，就是成本最低，收益最高，产量最多，质量最好，污染最少。这五个一组的优化目标，就形成描述某一生产力系统状态的五个向量。

第五，生产力是一个可控的系统。

生产力系统是由因果关系链连结在一起的耦合的诸因素的集合。根据机械和电器原理，一种因素的运行是与之耦合的另一种因素运行的原因，而第二种因素又会进一步影响直接耦合的其他因素。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运行中也有类似机械耦合运行系统中的情况。因此，引进控制论研究社会生产力各单元之间的耦合关系及其运行的控制和管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用的。所谓控制，就是指生产力系统的管理机构执行对生产力系统运行的控制时，要依据相应的控制信号，控制依据一定目的给出的“输入”值的变化引起的“输出”值反应，有目的的调节输入值，获得预期的输出效应。因此，控制机构的信息，来自两个方面。前一方面是世界环境系统对生产力系统的直接“输入”，（可称作“直接链”信号），后一方面是生产力系统的输出效应的“反馈”信号，由于这两个方面同时提供信号，因此生产力系统不能不是一个既有输入，又有反馈的“复合控制系统”。

这里，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物质、信息、能量的输入，作用于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对输入的物质、信息、能量进行加工处理、产生控制（指令）信号，再通过执行（调节）系统产生控制动作作用于受控对象，并将成果输出；另一方面，受控对象输出的物质、信息、能量等又反过来作用于控制系统，控制系统经过对反馈的处理，又产生调整的控制信号，通过执行元件产生调整动作再反馈给受控对象。

总之，生产力系统就是类似上述根据输入和输出的函数关系



施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控制系统，正是根据输入变化引起的输出反应与函数关系，确定如何“输入”才能获得更好的“输出”的途径，从而求得生产力系统运行的最合理的组织和最良好经济效果。

这里还应指出对生产力系统的控制步骤和控制的方法问题。就控制的步骤来说，大体是系统分析，系统综合与系统控制三大步，首先分析，要对目标、环境、构成、功能逐一分析，研究和比较各种可能的结果并给以评价；其次是综合，要比较优劣，挑选和评审出最佳方案；最后要拟定控制的措施和方法，合理调度。一般而言，优化的控制方法有运筹法，投入产出分析法，质量追踪管理，价值工程与成本控制，结构与规模的优化，等等。这需要作更加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第三章

生产力系统内的组合形态和合理化考察(上)

对生产力系统诸因素的组合,我们可以进行两个方面的考察,这就是它的分解和综合——分体组合与整体组合。生产力系统的总体性并不排斥我们先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对它作必要的局限性的考察。任何生产力因素的组合都离不开其质、量的内容与时间、空间的运动。因此,我们可以依次就其质态、量态、空间态、时间态等分体形态作一番分析。质、量、空间与时间,都是生产力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形式。

第一节 生产力系统内的质态组合——结构合理化

一、质态组合的三种链式

所谓质态组合,指生产力诸因素在构成生产力系统时彼此在



技术性质上相互适应的关联状态。这种关联是生产力系统诸因素在物质、信息、能量的转换和传递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关联方式。要获得什么样的“产出”，就必须先给定什么样的“投入”。例如要产出某系列高精尖产品，就必须投入高档的设备，高技术和高级人才，高等级的原材料，等等。这里，可以把质态分解成物质技术和劳务的属性、性能、档次、等级、规格等。

质态组合的目标就是要确定怎样的组合结构，才能把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结合成质态完全适应、关联合理的链，以获得最大的增产和节约。质态组合的实践形态就是讲求结构经济——善于发现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构成上的矛盾，改进和调整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人员结构)、产品结构、出口结构等，使之有更高的效率和效益。

质态组合，大体上可分为生产力实体内部的质态组合和生产力实体与非生产力实体间的质态组合两大层次。就生产力系统整体看，两大层次及相互之间的组合形成以下三种链式：

(一) 人力因素之间的组合链 指各类岗位人员(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人员)之间在质态上的配合与适应。表现为：生产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关联；生产人员与技术人员，科学实验人员之间关联；管理人员与科技工作人员之间的关联；生产、管理、科技人员与职业培训人员之间的联系；职业培训教员与学员之间的关联，等等。这些关联意味着要求各类人员在素质上互相配套，符合岗位与分工协作要求。

(二) 物力因素之间的组合链 包括：(1) 生产工具与原材料等劳动对象之间的关联。例如重化工业产品必须用重化设备生产；体积大和硬度高的产品必须有大型的加工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反映产品与工具在质态上的这种适应关系。没有高技术的专用设备，是不能生产出高级专用产品的。这里，工具设备制约着原材料与加工对象，反之原材料也制约着



工具设备的质量。例如没有特定的工艺设备就造不出特定的合成材料，可是没有一定的合金材料，也造不好相应的刀具刀具。(2) 能源及设施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联。这表现于发电厂的能源材料与设备之间的适应关系。例如我国能源政策多变，曾带来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间的矛盾。我国60年代末提出要用石油将工业用煤顶下来，结果许多烧煤的电厂陆续改成烧油。70年代末又提出要烧油的电厂和锅炉再改回来烧煤，但原来烧煤的那些设备大部分没有了，结果又耗费了大量国家投资来重建。这说明设备条件和原材料、能源在性质上的不适应，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3) 劳动资料内部关联。表现为机械设备与辅助设备和基础设施之间必须适应。例如厂房、道路、仓库等辅助设备、基础设施、电力等必须同主机在质态上配套，否则上了主机上不了辅机，生产设备的整体功能就发挥不出来，拖长投产期，降低动态效果。(4) 劳动对象内部多层次间的关联。这表现在各层次的原材料必须在属性上互相衔接统一。例如棉、纱、布匹和服装，既可以是上一个环节的产品，又可以是下一加工环节的原材料——加工对象。如果它们在质态上不协调，那就会打乱流水作业的生产秩序。在自然资源开发的不同环节上，如林业的采、育必须相互协调，只采不育，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开发水电资源，也必须把主体工程的修建(如水库坝基)同扩大绿化覆盖率、环保建设统一协调一致。否则就会使上游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水库、威胁发电。

(三) 人力因素与物力因素之间的组合链 指劳动者的工种、技能等级、工艺水平、文化程度等都必须同生产设备、加工工具及其它生产设施的性能，效率、现代化程度等相一致。否则人员素质与物质装备属性的口径不对头，生产力不仅不能得到发展，而且还会遭到破坏。如，一个只具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只能适应于小生产手工劳动；一个中专毕业的劳动者才能适应于机械化大生产；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大生产、宇航工业、



生物工程等则更需要相当于大专文化的专业人员方能适应。生产过程中这一属性上的配合，同样适用于管理方面，手工工具时代的管理方式、手段同机器时代就不相适应，而普通机器时代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很大程度上也不再适用于智能机器时代。我国80年代初曾引进了不少70年代末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如大量应用了“系统分析法”，“统筹优选法”，“临界途径法”，“投入产出法”，“价值工程”等，但我们不少生产与管理人员只能适应50、60年代，甚至40年代设备和技术的要求。不少省、区职工的平均技术水平只有三级工的水平。这种情况导致不少地区的引进设备利用率低。从质态上调整和解决各条组合链上的“不适应”，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质态组合的构型分类

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在质态组合形态上，因其要素比例、组合链式和产业特点不同，也具有不同的结构类型：

(一) 密集型 它是以生产力诸要素在组合时各自的比重和密集的程度，划分为“劳动(劳动力和人员)密集型”、“资金(投入大量的物质装备和固定资产)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三种。这三种结构大体反映了生产力内部结构的变化与趋势，因为处于工业化前期手工工业时期，一般属于劳动密集型。机械化工业时期，一般属于资金密集型。智能机器化时期，则属于知识密集型。

(二) 轻重型 以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划分为“重型生产结构”、“轻型生产结构”、“重—轻混合型生产结构”。这三种类型体现了生产力系统内诸要素组合在何种产业部门内占居优势，比重更大。

(三) 能耗型(物耗型) 以动力(或物资)消耗的多寡，划分为“耗能型结构”、“省能型结构”。物资消耗上也可分为“耗费型结构”、“节约型结构”两种。

(四) 高低型 以技术水平高低度和应用程度，划分为“高技



术型结构”、“中等技术型结构”、“初等技术型结构”三种。

(五) 软硬型 以一、二、三次各产业中物质装备和固定资本聚合程度及所占比重，划分为“硬型结构”、“软型结构”（劳务是一种“软”产品）。重型设备多的第一、二次产业比重大是为“硬型”，第三产业比重大，是为“软型”。

(六) 缓急型 以产业间各部门原材料与燃料供应与需求的矛盾程度，划分为“紧张型（挤压型）结构”，“缓和型结构”（“舒展型”）。认为供不应求是为“紧张型”，供略大于求是为“缓和型”。

(七) 产出型 根据产品状况定类型。大体又可分为：初级产品型、加工产品型和中转运输型。

上述结构类型中，各种归纳都不无道理，也各有其应用意义，但还存在不少难以界定的认识上的分歧。例如：“轻重型”，应如何界定其轻重标准，依照百分比划分是否科学，又如何判定其是否合理，等等。

三、质态组合的结构合理化标准。

生产力要素组合结构类型的选择与确定，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系统功能的发挥有重要意义。一是它直接决定着经济效益的高低。就一个企业来说，生产能力固然取决于生产力内部诸因素的投入量是否合乎比例，但更取决于各种投入的质态—关联结构。结构出效益，结构合理使实际能力超出“设计”能力；结构不合理，则实际能力将达不到“设计”能力。二是它具有强大的“刚性”。一种生产结构一经形成，其作用就不会是短时期内可以随意能够改变的，它将在一个较长时期中支配和影响产业门类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周期。因此，从发展战略上选择，讲求生产力系统诸因素组合上的结构优化这种“内含式”，较之追求增长速度的“外延式”，更有其积极意义。

那么评价生产力内部组合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什么呢？

首先，合理化的生产力因素的组合结构，应是一个运动着的



多变的结构，它是一个逐步完善化的调整过程，是由多项标准复合而成的标准系列。因此不能用只适用于某地、某时、某种质量的尺度，作为千篇一律的衡量准绳，照搬照套。例如：

所谓“比重定优劣”，认为农业的比重的相应缩小，工业比重、特别是重工业的比重相对扩大，被认为是合理的标志。这种“比重论”定优劣，虽不无道理，却并不很科学。如果我国农业中的装备技术构成高，农业品劳动生产率高、商品率高，满足需求率高，比重再小，也应视为合理。但在我国一个农民目前只能养活0.5—0.7口人条件下，人为缩小农业比重，是不合理的。

所谓“软”、“硬”见高低，也是一种“比重论”。认为第三产业这种“软”的比重愈大，结构就愈合理，这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其片面毛病。我国目前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产业比重在近期内愈大愈合理。这是因为：(1) 三次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分工完善的过程，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过程，只有第一、二产业的相应发展，然后为第一、二产业提供生产作业和服务的第三产业才能够根据客观的需要而得到合乎比例的发展；(2) 对劳务消费的需求与扩大，有赖于劳动群众的收入的增长，这又有赖于国民经济首先是第一、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3) 对劳务消费的扩大，必须依托于劳动群众的闲暇的增加，否则，即使劳动群众收入增长了，而劳动群众的劳动时间不缩短，业余时间不增加，劳动者要更多地从事娱乐、体育、教育、旅游等活动，也会因时间不足受限而不可能实现。可见，第三产业的比重的增长是有条件的，不是在短期内一蹴而就的。离开制约条件，笼统地说比重愈大愈合理，未免失之偏颇。

那么，怎样的生产力要素结合结构才算作合理化的呢？

合理的生产力要素结合结构，有多方面的要求，不是绝对的一条标准所能包罗无遗的。合理，应该是相对于一定时间、地点、



条件的状况而言的，衡量它的合理性应该是一个多方位的标准系列。就目前讨论的意见看，我们认为，合理的生产力要素的结合结构应当有如下的特征：目标高效益；框架整体化；过程协调化；终点多实惠。

以上四条标准中，“高效”是生产力运行的经济目标和出发点；“完整的框架”和“协调的过程”则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静态和动态的表现形态；带来更多“实惠”，则是生产力运行的归宿和终点。

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检验结构、政策是否合理，集中看三条：（1）政局稳不稳？人民是否安定团结？（2）生产力是否持续稳定得到了发展？（3）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这三点精辟地说明了结构的落脚点是人民获得的实惠。

第二节 生产力系统内的量态 组合——规模合理化

一、量态组合的目标和组合的三种配比

所谓量态组合是指生产力因素在构成生产力功能系统时，彼此在数量上比例上相互协调的状态。数量配比，这是生产力诸因素优化组合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量的规定性，既体现于诸因素之间的比例上，也表现于诸因素在系统中的积聚程度而形成的规模上。这种集聚不是彼此的瞎凑合，随意搭配，而是一个生产力系统有效运转所需的数量规定性。

量态组合的基本目标就是要确定怎样组合规模，才能把生产力诸因素在数量上结合得合理，配比协调，以获得最大的增产与节约。量态组合的实践形态就是讲求规模经济——善于发现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在聚集和配比上的矛盾，改进和调整投入与产



出的批量，使之更富有效率和效益。生产力诸因素的数量配比，大体表现为劳动者内部的人员配比，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等物因素间的配比；人力因素与物力因素之间的配比等三个方面。

(一) 劳动者人员内部的配比 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客观上日益要求提高体力劳动者的脑力劳动成分，同时不断地扩大“知识型”劳动者队伍。我国劳动力结构中(不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恰恰是“体力型”的劳动者多。“脑力型”与“熟练型”的人数偏少。配比很不协调。例如1984年统计，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中的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仅相当于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0.66%，卫生技术人员仅相当于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0.44%，研学研究人员仅相当于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0.07%，教员仅相当于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0.3%。^①

(二) 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等物力因素之间的配比 首先是生产设备的加工能力同原材料供应量必须协调。原材料供应量大于生产设备的加工能力，劳动对象就会有一部分闲置得不到利用。反之，加工能力大于原材料可供量，固定资产等设备就会闲置，形成浪费。其次，加工能力同动力之间也要合乎比例。现在我国约有1/3企业动力不足，很多单位“停三开四”，设备因缺动力得不到满负荷运转。例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投资43亿元，技术先进但电力不敷，相当时期内形不成设计的生产能力，开工率一个时期竟只有29%。北京地区因缺电，1983年曾拉闸3.2万次，1984年拉闸4.8万次，减少全年工业产值30亿元，财政减收9亿元。

(三) 在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内部不同环节在数量上，规模上的协调一致。例如主体设备的产出能力，必须同基础设施，辅机动力等相适应，否则，主体的产出能力根本得不到发挥。例如：我国城市各项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影响了生产单位的能力发挥。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594页。



1984年全国289个城市中有180个缺水，每日缺水达1200万吨，其中工业缺水720万吨，造成每年的经济损失达1500—1800亿元之多。

二、量态组合的指标与规模类型

衡量经济规模，常见的是如下的指标：(1)投入量；(2)产出量(以产品数量或达到的设计能力定其规模)；(3)产值(例如年产值三千万或亿元)；(4)上缴利税总额；(5)固定资产拥有量，(6)劳动者人数等等。上述这些表现规模的指标，各有各的使用意义和局限。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

经济规模，依照观察角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如下种类：

第一，按其组织层次划分，大体可分为：

宏观规模 国民经济发展或某一产业部门规模；

中观规模 由几个中心城市为依托组成某一经济区规模或地区规模；

微观规模 由某一企业的经济发展形成的规模或由某一企业为龙头聚集众多企业与之配套的横向经济联合体规模。

第二，按照经济实体内经济效益的不同程度划分，又可分为：

亏损规模 即销售收入小于成本消耗的规模，(例如处于试生产时期不宜于批量生产，销路尚未打开，无利可图)它表现为一个区间；

启始规模 即销售收入 \leq 成本消耗的规模，它表现为亏损规模和盈余规模两个区间的交界点，在这一点上，刚好“保本”；

盈余规模，(亦称合理规模) 即销售收入大于成本消耗的规模，它通常表现为超越临界点(保本)的一个区间；

最佳规模 即经济效益最高的规模，它表现为盈余规模区间内的一个点，在这一点上，收入最高，成本最低。



终止规模 即合理规模区间内的盈余额终结点。在这一点上，其成本消耗规模 \cong 其销售收入规模。超过这一点，其产品成本就会大于销售收入而无利可得，转为亏损。显然，科学地分析亏损与盈余额两种规模的区间，选择富有经济效益的合理规模、探索和追求经济效益最佳规模，是实现生产力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按照生产力因素在一定的经济实体内的聚集的不同程度划分，可以分为大型(或超大型)、中型和小型三种。例如过去习惯于把1000人以下的厂家定为小型厂，3000人以下、1000人以上的厂家定为中型厂，3000人以上的则定为大型厂。再如把产出量一百万吨钢的企业算大型钢厂，50万吨左右的算中型钢厂，10万吨上下的算小型钢厂。

一定的经济实体成为大型、中型、小型，主要依据于其物质、能量、信息转换的内外条件，这些条件可归纳为：

自然因素 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发展规模，对城镇的设置规模，都可以起到制约的作用。只有在动力和原材料供应充足的地方，才有可能建大型费能型产业。电力资源短缺的地方，只宜建立中小型省能型产业。

经济因素 主要是：产品的供求关系。例如从供给上看，首先是原材料的计划调拨或市场所能提供的数量及其价格的高低，价格适中，供应充足，则具备大规模生产条件；此外，还取决于金融市场提供的资金的多寡及其利息率的高低；劳动力市场提供的熟练劳动人员的数量及其工资成本开支的高低；技术市场提供的先进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程度，以及技术协作的条件和协作化水平；企业自身自我发展的活力高低(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力等)，这些都足以决定某一经济实体的投入规模及其经济效益。从需求方面看，如市场需求小、建立规模大的企业、搞大批量生产，产品就会找不到销路；如果生产设备能力大于市场上原材料的可供量，就会导致设备闲置，开工率不足。在这些情况下，都



需要调整规模，以求得经济效益。对于市场需求变化快，品种规格多、花色款式繁杂的行业（如服装工业、毛纺工业、制革工业、日用品工业）都不宜取大规模生产而以中小型为好。对于原材料充足、需求量大、品种又单一的行业（如造纸工业、建筑材料工业、金属材料工业、化工原料工业等），则宜于大规模大批量生产。对于原材料分散，产品不宜长途运输和流转、时效性强的行业（如食品工业、陶瓷工业，农产品加工工业）也不宜搞大规模而以中小型为好。

科技因素 随着科学发明和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的不断进步，某些重型加工行业的主导设备也逐步大型化。例如钢铁工业的主体设备——高炉已经从几百立方米发展到几千立方米的超大型。与此同时，某些相应的基础设施、生产辅机等投资规模也不断加大。

科技进步也带来与大型化相反的趋势，即导致一些产业的规模小型化、微型化。例如电子工业由于微电子技术的进步，这些年更新换代迅速，产品已从重量重变轻了，体积大变小了，体型厚变薄了，长度长变短了，品位低变品位高了，能耗多变能耗少了，操作复杂变操作简单了，价格昂变价格低廉了。因而象微电子工业的规模，又从大型向中小型发展。

社会因素 象政治军事形势、意识形态、政策方针等等都是制约规模经济的传统因素。例如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省区，由于靠近台湾的前线范围，相当时期内，没有安排国家大型工业项目上马，（长时期内放在大三线）。这是军事国防形势与当时的产业布局政策综合影响的结果。再例如人口和就业这个社会因素对我国不能过多地搞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只能多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优势。这一点就影响很大。

上述因素是一个作用整体，但作用的大小、强弱不尽相同，在某种条件下某种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在另一种条件下另一种因



素又起着主导作用。这些作用在方向上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作用方向则又相反。因此，对同一行业规模，不同的因素条件的影响可能不同；对不同行业规模，同一因素条件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一个经济实体，其规模是大型好？中小型好？都不能各走极端，以偏概全，应该具体条件具体分析，从总体上加以权衡。

三、量态组合的规模合理化原则与方法

经济规模既然取决于多种因素条件，当然也就不具备到处适用的绝对标准，但这不应当否认规模经济在确定经济规模时起最重要的参数作用。规模经济，一般表现为产量(产值)、成本(生产费用)和盈利(包括税收)之间的函数关系。其优化准则就是成本利润率的最大化或投入产出率的最大化，或相对一定的利润率和产出率来说就是成本和投入的最小化。按照这个规模经济的优化准则，应该注意研究如下一些原则。

(一) 大批量生产原则

首先，大批量生产会导致固定费用的相应降低。所谓固定费用就是不随产量变化而增减的成本部分。一条生产线不论批量大或小，都要整体的开动和运转，它的投入基本上是固定的。但当批量小时，分摊到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就会高得多；而当产量大时，分摊到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就会低得多。

其次，大批量生产能够使可变费用及不变费用降低。一是原材料需要大批量购进，而这往往促使原材料的进价降低；二是大批量的成品包装、运输、仓储费用能相对节省；三是大批量生产充分发挥了生产工具、设备、基础设施等的可利用率，减少了它们的闲置和浪费；四是大批量生产也有利于集中使用人力，开展分工协作，实行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五是大型生产要素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对小型来说要经济节省得多。

由于以上优点，大批量生产就成为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必然途径。这在轿车、电冰箱、洗衣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耐



用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上尤为突出。

(二) “短、平、快”原则

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的函数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正比例关系。经济效益只是在生产规模的适量上，才是最好的。因此考察优化的经济规模，也必须注意经济效益“短、平、快”。即：用最少的时间和投资，最迅速地获得生产成果并收回投资，提高投入产出率。为此必须防止资金占用过多，盲目扩大生产力要素投入额和单纯追求产量的增加。而是讲求投资效果，请求基建投资少，建设周期短，产出收效快，产品同市场对路。这里，可以集中考察年生产力效益的高低。

(三) 生产能力均衡配置原则

生产力的整体功能取决于生产力系统内诸因素和子系统间在质态上，量态上的适应性，相互协调，而不取决于某一因素或某一子系统的强化程度。因此，在生产力诸因素组合过程中，必须强调不同环节生产规模和能力的均衡配置，防止比例上不合理的匹配所造成的人力、物力的闲置和浪费。

(四) 专业分工与协作原则

实行专业分工和协作可以创造不依赖于机械设备的劳动生产力，使经济效益得到提高。这是因为在专业分工和协作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必从事自始至终的全过程生产而只分工于某固定工序上进行加工，提高了劳动的熟练程度；原来生产每种产品甚至整机的“大而全”企业，可以在分工基础上成为只生产某个零部件的单一产品的“小而专”企业。从“全能厂”转变为“装配厂”“零件厂”，但是实行这种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要以一定的经济规模作为前提，没有一定的规模，专业分工和协作就是没有意义的。小批量生产是容纳不了和承受不了专业分工和协作的网络的，是难以实现产品标准化和系列化生产，难以获得较好的技术经济效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规模愈大愈好、愈能实行专业分工，某些小型的适



度规模也可以进行合理的专业分工。

(五) 有利于采用先进技术原则

科学技术是当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因而经济规模的大小，必须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约而言之，机器设备大型化，有利于提高经济、技术指标。

从上述几项应予注意的原则来看，经济规模中的大型化、大批量生产和小型化、小批量生产两种趋势，都是客观存在。例如大批量生产原则决定了生产的成本低，这就具有大型化的趋势，而“短、平、快”原则使中小规模能投资省、周期短、收效快、从而具有大型所没有的优点。因此，经济实体平均规模的大型化与小型化都符合发展规律，也可以认为，在电力技术体系下趋于大型化，在电子技术体系下，又趋于小型化。在现代生产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的情况下，从能力规模上趋于大型化，从人员规模上则趋于小型化。科学的结论只能是大中小规模并举，大型化与中小型化共存，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相结合，从而我们确定经济规模的对策，应该是根据不同条件，因势利导，宜大则大，宜小则小。我国当前在宏观规模经济的对策上应强调在以大型为骨干的基础上实行大中小型并举，求得大小规模的适度与配合；而在微观规模经济的对策上，应强调控制新建厂的建厂规模标准，合理确定其应当达到的生产批量，以探求其最佳规模。



第四章

生产力系统内的组合形态 和合理化考察(下)

第一节 生产力系统内的空间态 组合——布局合理化

一、空间组合的目标和组合类型

空间组合。指生产力诸因素组合成生产力系统时在空间地域上的分布与关联状态。生产力诸因素进行空间组合的必然性，在于：首先，生产力诸因素之间的物质，信息、能量转换与传递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的，生产力的质态与量态只有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上才能够存在和发展。其次，生产力诸因素组合后因投入产出的特点不同，所要求的空间环境也各异。（例如农业需要的条件是土质，地貌地形、适宜的气候和水利；矿业则需要矿脉的分布与丰度。）但是，空间的地域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地域上气候、地形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有的地域人口密度大、城市的基础设施较好，海外市场信息传递快，技术、资本引进比



较容易，等等。这就产生了生产实体应选择在那个区域定点，在那个空间位置上组合的问题，也就是布局问题。所谓空间组合，就是指生产力诸因素和子系统之间，在地域上的分布与配置。

空间组合的基本目标，就是要确定怎样的空间配置才能把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结合成地域上位置合理、点线面布局适当，以获得最大的增产和节约。空间组合的实践形态就是讲求布局经济——善于发现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在布局上的矛盾，改进和调整点、线、面的关系，使之更富有效率和效益。所谓布局合理化，就是指生产实体选择的空間位置最适当，与所处环境协调运行，从而使生产力诸要素总体功能得到最大化。

具有一定质态、量态的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之间在空间上的组合，大致有如下一些基本形态：

(一) 专业分工型 这是根据一定地区自己的特点，资源与经济发展优势，和商品经济的分工原则，建立地区或跨地区专业化的布局。这种空间组合打破了行政区划和地区禁闭，不搞大而全、小而全，不搞重复建设，重复布点，实行横向分工协作。

(二) 利益指向型 指某种生产实体的产出，对某种生产力因素的依赖程度最大，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此生产实体以配置在制约它的某种因素的产地最近的地区为宜，因它可以就近获得原材料的充分供应和加工，又可节约运费；例如棉麻纺织厂对原材料的使用量和加工量最大，依赖性最强，因而它以设置在棉麻主产区最为适宜和得利。冶炼厂产品耗电最大，对能源动力依赖最深，因而它以设置在动力中心周围最相宜和得利。服装厂是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它对劳动力和销售市场的依赖程度最深，因而它以设置在大中城市或城郊最为相宜和得利；如此等等。上述“原料指向”、“动力指向”、“劳动力指向”都是企业最大“利益指向”，按照这种指向，选择厂址布点，以改善生产力诸因素在点、线、面上的组合关系，就是十分必要的。



(三) 投资速效型 指集中国家人力、财力,优先投资效益好、回收快的经济发展地区,有重点地进行建设项目布点,以便求得社会生产力的更快的发展。例如我国在“六五”,“七五”时期,已把沿海地区作为布局的重点地区,这是因为沿海地区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地理条件优越,信息灵敏,生产技术和水平都比较高,引进外资和现代科技的环境不错,开展协作条件也好,因此同样投资,投在沿海肯定比投在西北内陆地区要效果好,收益多。这种择投资之“优”进行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的组合,是当前的一个突出的布局类型。

(四) 补偿互益型 指两大生产实体投入产出彼此相关、互相补偿、互为条件的,从而相“伴生”的布局形态。例如,焦化厂和热电厂常常布局在一起。这是因为可以利用焦化厂的余热发电,利用热电厂的电力炼焦,使双方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再如化工厂与“三废”综合利用厂在生产因素组合中也可以“互补”。化工厂输出的“污染”(废水、废气、废料)可供综合利用厂输入回收,既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又可以化废为宝,回收“三废”中的有用物质。两个不同地区(例如经济作物区与粮食产区)的生产实体之间也可以相互补偿,彼此提供各自产品和劳务。

(五) 乘数效应型 指某种企业的投入产出,往往会促成另一种或多种企业的生产和服务的相继出现。这第二种的投入产出,又会引发和促使第三种投入产出的出现;而这一轮的生产和服务,又会促成另一轮更多一轮的生产和服务的相继出现。这种一轮一轮地引发而呈现的投入产出、需求供给的连锁反应或乘数效应,是生产力诸因素和子系统之间进行空间组合的一个重要“链”型。

(六) 空间收缩型 指在运输和信息条件不变情况下,为使诸生产力因素之间在组合时地面距离上最短、运行速度上最快,从而较之地面距离远、运行时间长的组合更富效率和效益的组合形



态。我国曾花费巨大投资兴建的大小“三线”，由于布点时只顾隐蔽的地形，结果造成很大浪费，就是违反了空间收缩原则。后来国务院不得不命令第一批一百多家三线企业迁出深山老林，这当然是符合布局经济的明智决策。

二、宏观布局的任务、原则及其合理化探索

产业的布局按照空间大小，首先是宏观层次的布局，其基本任务是划分全国经济区、确定产业部类在全国的总框架及战略走向，确定全国产业布署的总蓝图及其实现措施，确定全国重点产业项目的分布，确定不同经济地带的投资方向和不同时期内的发展规模。

宏观布局必须考虑的原则是：

第一，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稳定的发展和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需要，必须在总体上、战略上合理地分配和使用各种资源，正确安排固定资产投资和重点建设项目在空间上的分布。

第二，从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这一宗旨出发，要纵观总体，横览全局，长期筹划、整体布署，协调和处理好原材燃料基地，生产加工基地、和消费市场的关系。

第三，要有利于振兴全国经济、实现各族人民安定团结共同富裕必须统筹安排，正确处理好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发挥地区经济优势，发展区域生产专业化，选择合适产业集聚经营以充分利用各地区人力、财力、物力，充分发挥专业化协作配套形成的综合生产能力。

第四，要有利于资源的综合利用，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必须充分注意布局对环境的影响，充分利用自然界的自净能力，作好对“三废”的处理，防止污染和各种公害。

第五，要有利于保障国家独立和安全，必须在布局中注意国际环境、地理环境、和军事因素的基本格局，以充分保证产业布



局的国防需要。

从上述基本任务考察，我国的原有布局极不合理。旧中国的产业首先集中于盛产资源和交通便利的少数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上海及长江三角洲，辽沈、冀东地区及有数的几个铁路沿线上的大城市。广阔内陆和边疆地区的工业很少，占全国70%面积的西部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10%左右^①。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产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我们采用了平面的地区平衡发展战略，布局重点移向内地和边远地区，有计划地使产业布局西移。这样，现代产业从原来仅仅集中在沿海、沿铁路线、沿江（长江）分布的格局，开始转向我国内陆，改变了产业分布极不平衡的历史格局，扩大了我国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经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国家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繁荣发展增添了新的实力。一大批新工业城市和新工业区在地图上的涌现，既改善了内陆区工业品的供给率，为边远地区开辟了工业品市场，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又提供了老工业基地以大量新的动力。能源、原材料，为老基地的产品换代走向高、精、尖，创造了条件。此外，内地工业经济区的出现，还壮大了内地工人阶级队伍，促进全国规模的经济网络的迅速形成，改变了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但是我国的布局战略也出现了某些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失误，这就是忽视了区域经济空间成长的一般规律，没有准确地把握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过于把产业平面布局均衡化及国防原则绝对化，未能处理好一二线和三线的关系。其表现为：一是三线投资比重过大，延缓了东部沿海地区老基地，老企业的更新改造。二是西部的产业布点过于分散和偏僻，未能协调好原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10月9日新华社报道。



材料基地，加工业基地和消费市场的关系，降低了投资效益，并形成了不少浪费。三是布局西移招致的机会损失。由于把有限的人、财、物力大量投入到建设效益较差的西部，这就缩小了对东部地区的有利投资，从而就从总体上延缓了全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在宏观布局上作了新的调整——把布局重点放在东部沿海地区，以沿海发展来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按照国家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投资重点由内地转向沿海地区，这有利于充分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费用低廉、人才素质较好、交通方便、科技开发能力较强的优势，这对于沿海加快经济发展，推动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经济，走进国际市场，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战略实施10年来，使我国东部经济取得了显著进展。最明显的事实是同样一笔投入，东部沿海地区能较西部地区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率。例如198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全国平均为1.31，但江苏省为2.05，浙江省为2.03，广东省为1.66，上海为1.92，天津为1.61，福建为1.52，山东为1.49，北京为1.43。而我国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陕、甘、青、宁各为0.90、0.76、0.62、0.70，新疆为0.91，贵州为0.78。这就是说，同一笔投入，投在沿海地区要比投在西部地区，生产率一般可以提高1—3倍。

但是，国家投资向沿海倾斜（“六五”“七五”期间，国家在沿海投资的比重已占1/2以上，大大超过1953~1980期间40.6%的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也带来不少新的问题。一是东西部的区际差异拉大。以1985年为例，西部11省占全国面积70%，占全国人口23.6%，但工农业总产值仅占全国17.2%，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702元，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一点，只及东部平均水平的38.9%。“六五”（1981~1985）期间，西部总产值增加了776.8亿元，但同期东部则增加了2575.2亿元，后者是



前者的三倍多。二是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较差，而东部经济基础厚实，技术水平高，增长机制良好，比西部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因此，沿海工业品较西部工业品具有明显的区际间的市场优势。同时西部生产要素、人才、资金东流也很严重。例如甘、青、宁、新外流的专业技术人才达2.2万人。西南“三线”拥有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目前已流失1/3以上。西部四省区的储蓄存款余额及投资，受经济效益和利率驱使，也多流向东部地区。

上述布局态势、表明我国东西部布局既存在着合理因素又，存在着亟需重新调整的必要性。为了进一步取得布局经济效益，纠正布局中出现的偏向，我们在宏观布局上，既不可回归到在低水平上去“拉平”、维持区际平衡发展、放慢宏观经济发展速度的老战略上去，也不能任凭东西矛盾扩大化，加剧东西的梯度，无视西部处境维艰的格局。因而必须采取“补台”的方针，把东西部的发展和协调统一起来，做到在发展中求协调，在协调中求发展。我们赞同东西部好的地区实行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互通有无的对策，而不是单打一搞“一头沉”。事实上搞“东西协调”，有可能比搞东部的“一头沉”发展得更快些。同时东西部也需要彼此互济、互补。这是因为我国东部发展外向型经济虽有优势，但却还需要中西部地区有稳定的促成它发展的原材料和能源基地，这就有必要在东部发展的同时要动员和促进中西部的资源开发。与此相应，沿海地区跻身于国际分工后必然需要更新和改造产业结构，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生产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这就会为中西部发展商品经济腾出必要的国内市场，促进中西部传统产业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此外，东部沿海作为我国的窗口，它的开放和引进，还有利于加速先进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向中西部推移，减少因内陆偏僻而产生的智力时差。实践也将证明这种“互济”、“互补”的思路，肯定要比搞东部“一头沉”更好一些。



其次，目前先发展沿海地区，再以沿海为轴线向西展开的战略，是否可以逐步调整为优先发展沿海、沿江（长江）、沿线（陇海铁路）的“三沿”战略。^①我国沿海并不是唯一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区域，长江沿岸也是我国经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它早就拥有“黄金水道”之誉，且已有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据专家评估，长江的航运能力相当于14条铁路，而目前只利用了它的17%。由于它的水深运力大，行船吨位高，早在上一世纪就已成为列强入侵中国的通道。中日马关条约，就曾规定过重庆港的开放。长江上中下游还拥有众多辐射力很强的大中城市，是我国最有发展潜力的生产力带，搞活长江流域就可以搞活大半个中国（南、中、西）。近代历史证明，“黄金海岸”必须和“黄金水道”结合，才能发挥中国的整体优势，它的发展既可为西部地区建立更多的生长点，又会促进沿海发展战略的更快实现。

以上分析表明，有利的机遇并不是只限于“沿海”所独有，“沿江”也能大有可为。当然，后者采用什么样因地制宜的开放战略，这还可以专文研究。

三、中观布局的基本原则和合理化

产业布局的中观层次，是产业在特定区域，即某个经济区空间范围内的分布与组合。考察布局的中观层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合理划分经济区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在地域上的表现形式，也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商品化的根本要求。合理划分经济区，搞好中观层次的产业布局，有利于确立与完善国民经济体系，充分发挥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经济中心作用，有利于产业合理分工协作，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地发挥地区优势。产业的中观布局其基本任务是：按照全国经济发

^① 参见张国宏：《论我国生产力布局中的短期行为及调整战略》，载《经济科学》1989年第3期。



展总目标，总战略制定和规划本区域的经济发 展蓝图，确定具有本区域特点和优势的产业门类 和产业结构，建立能够扬长避短的不 同类型的产业基地。具体言之，它应 涉及如下内容：

第一，要对区域内的资源和建设条件进行科学评估，摸清区域内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地区产业的内在联系，确定好专业分工和产业发展的门类与途径，并做好产业发展的前景预测。

第二，合理布局工农业系统、商品流通系统、交通运输网络以及基础设施系统。其中对工业主要是安排好工业企业的定点选址，新、老企业的成龙配套、分工协作，正确处理工业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对农业布局，则应考虑合理安排区内农、林、牧、渔的生产用地，确定城镇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及其供应、调节体系；此外，还必须统一规划区域内的交通运输网络、电力、煤气、通讯、给水、排水等基础设施。

第三，科学地确定本区内主要城市的性质、规模、职能、合理布署城镇体系和居民点体系。

第四，安排好区内环境的保护和整治、城镇的绿化，以及保持本区生态平衡等。

中观产业布局的基本目的是实现和发挥区域产业优势，而区域内产业有无优势，是区域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所在。考察产业有无优势，方法就是将某一产业在生产、流通中的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量，换算成费用，能使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而且在质量上、价格上有竞争力，在全国和地区的市场上拥有较大的销售率。因此，优势产业产生于生产(流通)费用和市场占有率的比较之中，并在两者的函数中“优中选优”、“劣中择较优”，从而确定好区域内的优势产业。

从上述中观层次布局任务考察，我国原有的地区布局不尽合理。例如50年代就已划分的沿海地带、内地地带，前者主要布局



的是密集的加工工业，而后者主要布局的是密集的原材料能源工业。结果，内地的原材料被送到沿海加工，制成品再返回内地销售，出现了劳动地域分工上“双重错位”。同时，由于原材料能源价格以及初级产品的利润偏低，同加工品的比价扭曲，也导致内地创造的部分价值转移沿海，不利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内地要求通过发展地区内的加工工业来繁荣本地经济，不愿只为沿海提供廉价能源和原材料的趋向，使争夺原料、争夺市场的矛盾愈来愈突出。

我国60年代，从战争的需要出发，全国又区分成一线、二线、三线三大经济地带。这一划分，基本上不是按照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布局的合理化原则来要求的，更多的着眼点是备战的需要，结果配置了许多形不成综合生产能力的工业项目，出现许多“投入多、产出少”，甚至“只投入、不产出”的不利后果，不得不在八十年代进行陆续的改造和调整。

近些年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地区又重新划分为东部沿海、中部内陆、西部边远三大经济地带。每个经济区按照布局优化原则，都应发展各自优势产业，扬长避短，并在“全国一盘棋”中发展自己的优势。例如：东部地区具有技术、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和对外开放、引进的优势。东部沿海在布局优化上应贯彻“内联外挤”方针，致力于对原有产业的技术改造，发展新技术产业，变劳动密集为资金技术密集，使产品和原料挤进国际市场，取自国际市场。而不是过多地同内地争原料、争市场。由于东部能源、原料的相对不足、交通运力的局限，因此东部不宜再布局更多的能耗高、水耗大的工业项目。中部地区则宜发挥“三基一廊”的区域优势，即形成以晋陕为中心的能源、重化基地；形成以皖豫为中心的煤炭、钢铁基地；形成以滇黔川桂为中心的煤电、钢铁、有色金属基地。同时还要充分发挥长江工业走廊优势，大力开发利用长江的水电资源、航运效益，解决好原



料产品的输入输出问题。西部地区需要解决区内自身的六大矛盾：自然资源储量巨大但开发难；基础设施缺乏但存量利用率低；依赖中央财政多但运用资金能力弱；人力素质偏低但知识人才却又外流严重；少数中心城市发达但广大地区贫困；区内中央企业规模可观但地方工业薄弱，显然，发展西部经济，就必须合理解决上述矛盾，增强西部内在的增长机制。同时还要处理好区际利益关系，就是要在支持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发展自己，利用好现有的资源和固定资产存量，完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能源、原材料的产业优势，尽力满足沿海地区市场的需求。这样就可以一方面减少沿海对内地资源需求，减少同内地的摩擦；另一方面又可促使沿海工业放弃部分国内市场，让渡给内地发展，为西部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机遇。

四、微观布局的基本规律和合理化

产业布局的微观层次，是生产要素系统在企业这个“点”上的聚集与组合，它表现为企业的空间布局。微观布局所要回答的是如何选择与确定企业的区位、厂址、厂内布局的问题。它重点考察区域内生产实体的建设条件、环境、座落(东、西、南、北“四至”)设计与安排好厂内主机与辅助设施之间的衔接与距离，生产与运输、主体车间与辅助车间之间的衔接与距离，生产区和生活区的衔接与距离，搞好厂内的生产环境与生态等等。产业微观布局是整个产业布局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因为不解决好“在哪里生产”的问题，那么为谁生产、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等，也就缺乏“立足点”。

首先，是企业的选点，选好生产实体在一定区域内集聚的基点，这是取得投资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前提，它应当遵从本地区和本市的发展方向，要考虑地质地理条件和国防安全，要注意保护周围生态环境、治理“三废”，等等，但是还一定要遵守工业“指向性”的原则，即依照生产费用最小原理，把企



业依照产品的生产特点分为不同的“指向”类型。^①

其次，是厂址布局。选择企业的座落，位置，是微观布局另一环节，也是厂内布局的基本前提。它是在选定的厂点区域内所占用的“四至”空间范围。确定厂址应首先符合地区的发展规划，要符合工厂生产建设的要求，也要满足职工方便生活的需要。为此必须：(1)搞清楚建厂条件和它所要求的地质、水文情况，要避免断层、熔岩、流沙、矿床、泥石流冲击的地段；(2)地形、地貌必须有利于土地平整和便于给水、排水；(3)要拥有必要的水资源并便于处理废水；(4)要便于原料和成品的运输，交通方便；(5)要便于建设基础结构和基础设施。此外，还要保障有足够的工厂发展余地，并方便职工的生活。

最后，是厂内布局。即对厂内的生产区，辅助区、职工生活区进行合理分区，对厂内交通干道进行合理安排，以有利于生产流程的运行和职工的业余生活，包括住宅、食堂、托儿所、运动场、卫生所、剧场等设施的安排。

以上三个层次，构成产业布局的总体。其中宏观布局制约着中观布局；宏观布局与中观布局又制约着微观布局。但是微观布局决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可以自身布局的优劣、反馈于中观与宏观布局，给前者以巨大影响。

宏观、中观、微观总体上讲，各自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不具有彼此排斥性。但由于各级地方利益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三个层次间的矛盾，也是存在的。要做到布局系统的协调、优化，就必须在市场调节的同时，更要强调中央的计划调节和政策引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运行体制的优越性，和布局政策的权威性，克服布局中的短期行为，实现总体布局的合理化。

^① 参见程孟飞：《从生产力配置看地区优势经济结构》，见《论生产力经济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3页。



第二节 时间态组合与时序合理化

一、时间态组合的目标和类型

时间态组合，指生产力诸因素按照不同形成时间和功能持续的时间长短而确定的进入或退出生产过程的先后时间次序。

生产力诸因素和子系统，不仅要在空间位置上组合，而且也要在时间顺序上组合。时间组合的必要性在于：

第一，组合在一起的诸因素，其技术属性和功能是不一样的，生产它们的形成时间各有不同。有的时间长，（如劳动者需要一个学知识和业务培训的长周期），有的时间短，（如原材料，经过开采破碎，筛选后即可形成）各种生产工具也因各自体积，加工能力、精确度不同，形成的时间长短也各不相同。

第二，组合在一起的诸因素因其物理性能和使用价值不同，各自在生产中的消耗（消费）时间也不同。例如原材料经过一定时间的加工，其物质形态迅即转换为其他物质形态，而退出生产过程。只受了一定磨损的生产工具仍能长时间继续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劳动者的劳动周期虽然可长达几十年，但是每次定批同生产资料结合的时间也只能定时（如每次结合八小时），这样，各因素在生产过程中驻留时间也就长短不一，参差不齐。

第三，各因素因投入使用量的多寡不同，在途运输和仓储的时间长短不同，因而也呈现出长短不一的时间状态。

时间组合的基本目标就是要确定怎样的组合时序，才能把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结合成在时间上先后合理有序，上下衔接紧密的时序链，以获得最大的增产和节约。时间组合的实践形态就是讲求时序经济——善于发现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在时序上矛盾，改进和调整它们的结合时序，使之更富有效率和效益。



生产力诸因素的时间组合，大体上有三种基本的组合类型：劳动者因素与生产资料因素的同步型；生产资料内部因素的同步型；劳动资料内部的同步型；

(一) 劳动者因素与生产资料因素的投入同步型 主要解决劳动者的业务技术水平同生产设备在统一投入生产过程时，是否在时序上衔接的问题，例如劳动者不适应新的生产手段的技术状况，发生劳动者的技术老化情况时，为求得两者组合时在投入上的同步，必须对劳动者作超前培训；反之，技术装备老化，不适应生产过程的要求则设备应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更新与改造物质装备的技术程度。

(二) 生产资料内部因素间的投入同步型 主要解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在生产过程中结合时，是否在时间时序列上的衔接问题。例如技术装备的加工能力提高(或下降)后，在单位时间内，对原材料的加工时间大大缩短(或延长)，按原来的原材料供应量进入结合的生产过程，在时间的配合上已经不同步势必“吃不饱”(或不够吃)，停工待料(或原料超储)，结合过程也将中断。为此，必须在组合时间内按加工能力增加(或减少)原材料的供应量，并使原材料超前(或滞后)生产，以使两者在生产消费上重新同步。

(三) 劳动资料内部(生产设施与基础设施之间)的同步型 主要解决加工过程与给水、供电、送气、运输等在统一投入生产过程时，是否在时序上的衔接问题。如果加工设备竣工，但基础设施迟迟还上不来，则加工设备因不能投产或不能满负荷运转，而造成加工能力的浪费。

二、生产力时序的基本形式和层次

时间，从其自然意义看，具有过程的不断连续性，一往直前，停留不住，不可逆反。从其经济意义看，除了不可逆反的纵的持续性这一特性外，它还具有横向同步并行性，即某几种活动可在



同一时间里同步安排，以达到节省时间的目的。依据时间的这两点特性，生产力的时间组合也具有两大基本形式：(1)同一运动的主体在连续的自然时间里“依次继起”，(2)不同的运动主体在连续的自然时间里“同步并行”。根据第(1)种形式，我们应该研究生产力诸因素在组合为一个系统的时期内，如何保持自己纵的延续，以取得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根据第(2)种形式，我们应该研究生产力诸因素及各功能子系统，在组合为一个总系统的时期内，如何在横向上并行不悖，彼此配合和衔接，以形成系统功能，求得整体效益。

不论上述哪一种时间的组合形式，都具有三个层次的时序，这就是宏观时序，中观时序，微观时序。

所谓宏观时序，是指国民经济一级的时序。它包括：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发展时序，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大产业部门的发展时序，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发展时序，材料工业、动力工业、加工工业同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时序，基础设施与基本生产部门的发展时序，生产建设和生活消费的发展时序，等等。注意调整和优化宏观时序，有助于社会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以及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并给社会以更大的经济效益，给人民生活以更多的经济实惠。

所谓中观时序，是指国民经济与企业群之间的地区和部门的发展时序。它包括：各经济地带和经济区的时序，经济地带或经济区内各产业部门(及其内部)的发展时序，大中小城市群的发展时序，等等。中观时序较之宏观时序有其更具体的“区情”，“省情”、“地情”的制约。优化中观时序，有助于经济区和部门内产业结构、规模、布局的合理化，促进地区和部门的经济的发展。

所谓微观时序，是指城镇或企业群(包括企业内部)的发展时序，它包括市区和郊县的发展时序，横向联合的主导企业与配套企业的发展时序，企业内部各职能车间、班组生产的发展时序。



微观时序是最基层的时序。讲求微观时序，对改善和优化中观时序、宏观时序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三、时序合理化的途径和方法

(一)形成时间和结合时间的协调

生产力巨系统，是由生产力各实体性要素和各功能分系统的相互结合并形成一定生产能力的总体。从生产力的三大实体性要素考察，各个要素在相互结合以前，它们都有自己不同条件下的形成过程。例如劳动对象，要经历从自然资源到勘探和采掘以及再加工精选的过程；劳动资料则要经历冶炼锻铸和机械加工和被制做的过程；劳动者则要经历职业所必需的文化与工艺的训练和学习过程。所谓的形成时间，就是指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从非生产力的实体因素到成为生产力的实体因素所耗费的生产时间。生产力各实体要素的生产时间，依实体的不同而异。这是因为彼此机制、特点和形成过程不同，自身的物质属性不同、环境和条件的不同，从而各自都有不相等的形成时间。

生产力的各个要素的形成时间是不相等的，但是他们都必须要在同一个时点上进行结合，否则就不会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谓结合时间就是指生产力的各要素自身形成后，在同一时点上会聚，彼此互相作用，变潜在的生产力因素为现实的生产力整体的时间。这样，生产力各个构成因素自身形成时间的差异性同它们相互结合时间的同一性便产生矛盾，即从同一的时点上，某些因素因自身形成时间短，早已经结束了自身的形成过程，而另一些因素因自身形成时间长而迟迟尚未形成。这就出现了在同一时点上三个实体性要素难以实现结合困难。

为了求得形成时间的差异性和结合时间的同一性之间矛盾的解决，首先，对生产资料的形成时间同结合时间发生的矛盾，可以有如下的解决办法。即：(1)可以在实体性诸要素相互结合时采用事前贮存一定量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办法，以事先储备



的生产资料替补形成时间较长的即还在生产之中的生产资料，以保证同一结合时间内各生产力要素实现整体性结合的必要。(2) 对于不能事先储备或不具备储备条件的同时又尚未形成的生产资料，则应倚靠和加强科学技术这一渗透性功能，寻找相应的代用品，以保证同一结合时间内各实体性要素实现整体性结合的必要。(例如通过新的科技发明用某一新的合成材料代替传统的原材料。)(3) 推迟各实体要素互相结合时间，以待形成时间最长的生产资料完结其形成过程，求得在时点上的同一性。(4) 超前安排形成时间长的生产资料先行生产，拖后安排形成时间短的生产资料错后生产，以求得在同一时点上的取齐与平衡。

生产力要素中除了体现为物因素的生产资料而外，还有人的因素——劳动者。劳动者的形成时间与各实体要素结合时间，可以有两种相矛盾的情况，其一是劳动者的自然成长周期同生产力的结合时间不适应——没有足够适龄的成年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这种情况多发生于非常的原因，例如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导致大量青壮年人口伤亡，破坏了劳动者正常的形成周期。其二是劳动者的教育训练周期拖长，同生产力的结合时间不平衡——没有高素质的合格劳动者投入生产。这种情况多发生于社会不安定的动乱时期，例如十年文革的动乱，中断了劳动力的培训周期，并使大量不熟练的劳动者加入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过程。对前一种矛盾的情况，可以通过加强科学技术的渗透性功能的途径，利用更多的自然力和机械力来弥补人力的不足，(如采用机器人生产)。对于后一种矛盾的情况，可以通过加强教育功能途径，超前培训熟练劳动者，或对现役人员采取职业轮训等办法来解决。

(二) 终结时间和起点时间的协调

上面已经指出，结合时间是生产力各因素会聚在同一时点上彼此相互作用，变潜在的分散的因素成为现实的生产力整体的时



间。生产力各因素结合成生产力整体的运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上述所说的结合时点，实际上也不是短促的一刹那。例如基本建设就是生产力诸实体要素（包括各功能分系统）在结合中从勘察、设计、备料、运输、调配施工机械、集结施工队伍、进行建筑安装的一个长过程。

在不同的生产单位、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力诸因素的结合时间，并不是相等的。有的结合过程需要较长的结合时间，有的结合过程只需要较短的结合时间，这种结合时间上的参差不齐，导因于各个结合过程的不同特点，即参加聚集的各生产力因素本身特点的影响。例如钢铁工业部门的劳动对象、体积大，重量重，对之进行加工的工具也必然是重型的，其建筑和安装的工程量也必然很大，工具安装的地基也必然要求承重性能高，凡此都决定着投入使用的周期要长。象上海宝钢有好几个三四千立米的大高炉，年产钢达五百万吨的重型厂，要求地基能承载重负荷的厂房和加工机械，因而原来的软地基必须加固，以致于我们不得不在地面下打下了近20万吨的无缝钢管桩，多花费10到12亿元的投资，所耗时间也远比一般钢厂长得多。反之象纺织工业、轻工业部门，其劳动对象重量轻、加工难度低，产品较为单一，部件也不甚复杂，建筑工程量及工具安装工程量都要小得多，基建周期相对也要短得多。宝钢一期工程就用了4~6年，而一个纺织厂的基建工程量不过1~2年。同样道理，即使在同一部门，或同一企业中，由于加工工序和产品要求不同，从而各要素的结合时间也会呈现出长短的不同。可见，生产力诸因素在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不同车间，其结合时间依各自生产条件及其自身的复杂性不同而有所不同，不会完全相等。

所谓终结时间，是指生产力诸因素为了实现某种生产要求而完结其相互结合的时间，它表现为各因素在结合阶段上的终止状态。正由于生产力诸因素的结合时间在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不同



车间、班组不相等，从而它们完成结合运动的终结时间也就不会相等。结合时间愈短，其完成结合的终结时间也愈短，反之则愈长。这样，在一个有机的生产力系统中，在一个等距离的时期内，生产力因素的结合将参差不齐地表现为有的已完成了相互结合的过程，有的则未完，有的则正处于结合之中。为了使结合时间不等的诸因素能在同一时限内完成结合，求得彼此终结时间上的一致，以提高产出的整体功能，就需要把本来结合时间不等的过程在终点时间划一后，要依各自所需的结合长度向前延伸，使那些运行时间长的，在起点时间上提早启动；运行时间短的，在起点时间上晚些启动。

所谓起点时间，是指生产力诸因素为组合进入生产过程而互相结合的开始时间，它表现为结合中的初始状态。这样，在不同等的起点时间上，就出现了先后次序和缓急之别。结合时间长的，其起点时间要超前排列；结合时间短的，其起点时间要滞后排列，产生了起点有先有后的不同序列，其作用在于使结合时间长短不一的生产力诸因素，在不同的起点时间上开始其结合运动，以便在同一的终结时间完结其结合过程，从而求得生产力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

研究时序经济中的“终结时间、起点时间”范畴，有助于在实践中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安排好基本建设。例如，对于建设周期不相等而又相互联系的各个基建项目，它们之间就有一个合理组织开工建设的时间序列问题。对那些周期长的基建项目必须超前一步安排，使其先行开工。对那些周期短的基建项目，则要拖后一步使其延后开工。这样就可以使周期不同的基建项目，都在同一的时间中竣工，终结其结合过程，配套成龙地交付使用。

（三）运行时限比例与运行时限链的协调

生产力诸要素，不论是人、物，都有其一定的运行负荷和时限。超过则其机制和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甚至出现事故，破坏



了生产力。这种诸因素运行中的时间限制，我们称之为“运行时限”。“运行时限”，一般取决于各因素自身的性能和条件。就劳动者来说，劳力的使用的生理年限约三、四十年，超过这个生命自然周期，劳力效率就会下降；同时每日不可能24小时连续作业，必须有休息、吃饭、一定闲暇，以恢复被消耗的体力和脑力。再就劳动工具来看，它本身的物理、化学性能决定它的运行也有界限，运行到一定时间后，它就会出现“疲劳”现象，如机体温度升高、声音异常、运转变态、丧失性能等，如不停止运行、冷却“休息”，就会导致事故发生。再就劳动对象看，农牧业中的种植物和饲养物，也都有其生长、生殖的时限，超过时限就只会误农时。

正由于生产力各构成因素的自然、物理、化学的特性不同、机能各异，因此它们会聚在生产运动中各自的运行时限也就彼此不等。因而在同一个时间中很难都完成统一的运动。当运行时限较长的因素仍在继续运行时，运行时限短的因素却已停止了运行。若要求得运行时限不等的不同因素，在同等的时限内统一运行，那就必须采取变通的方法，即按照各因素运行时限的差别确定成一定运行时限比例，使运行时限短的，按比例地、分为数批地进入结合过程，从而使各批的结合时间，连接成先后继起的运行时间链，并与运行时限长的因素的结合时间链相等同和协调一致，以便统一地结成完整的生产力运动。各因素统一运动在一个过程中同步运行，并保证生产的运动连续进行。

显然，在生产力诸因素相结合的整体运行中、区分各因素的运行时限，使短链与长链按一定比例协同动作，这对合理组织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四）物质更新中的“新因素”与“旧因素”的更替

构成社会生产力的诸因素，依其运行时限的长短而必须在结合过程中形成互相配合的运行时限链。时限短的因素要按照一定



时限比例，在物质形态上实现新旧因素的更替。即当旧因素已经消耗完毕或磨损掉以后，必须以同一性能的新因素进行更替。这一更替在时间上应该是紧密衔接起来的，不容有任何耽搁，否则更替中断将导致整个结合过程的中断。

但是新旧因素的更替从分解动作上考察不能不是一个过程，即：旧因素逐渐地消耗完或磨损完，而新的因素也逐渐地形成和产生。这一过程应该是同一时间阶段内两个平行的同步过程，而不能是先后继起的两个时间阶段。如果旧因素的消耗时间或被磨损时间，同新因素的形成时间、产生时间是一先一后的两个时间阶段，即旧因素消耗尽或磨损完以后，才是新因素开始生产和逐渐形成之时，那么两者在衔接上势将中断，诸要素的结合也将在一段时期内终止。

第三节 整体组合—— 管理也是生产力

上述质态组合、量态组合、空间组合、时间组合，都是生产力系统内诸因素（子系统）之间依托于某一种角度的分体组合形态。事实上，这些分体组合形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在一起的，发挥着合力的作用。但是，质态、量态、空间态，时间态四种分体形态之间，作用并不完全是同一性的，结构的合理化不等于规模的合理化，也不等同于布局或时序的合理化。另外某一分体组合的优化，也可能带来另一分体组合的不优化，形成内部之间的消耗和相互之间的摩擦。例如某类产品可以扩大批量生产，但却导致布局的劣势更加发展。因此，要克服上述问题，解决内部各分体组合之间的摩擦与内耗，求得各种组合的同一性并协调一致的发展、就需要在分体组合之上，产生一种囊括



质态、量态、空间态、时间态为一体的总体组合方式。所谓总体组合，就是前四种组合的组合，它不拘泥于分体的某一种组合的最佳化，而是立足于具有综合效益的总体功能的最佳化。这是因为某一分体组合形态的最佳化，都不等于总体组合的最佳化。这正如上一章第一节开篇所指出的，生产力的系统功能可以大于诸因素的元素功能之和，而总体组合具备的系统功能，也可以大于各分体组合功能之和。生产力系统的总体组合的基本目标，就是协调分体组合中的各种组合形态之间的关系，克服内耗、减少摩擦，统一运筹，确定怎样的综合管理才能把分体组合的质态、量态、空间态、时间态，组合成最佳的合理链，以求得总体功能及宏观效果的最大化。总体组合的实践形态，就是讲求总体经济一善于发现分体组合内部的内耗和摩擦，改进和调整分体组合内部的不协调关系，发挥整体功能优势，使之更富效率和效益。

总体组合的实践，就是社会化并成为体系的生产管理，它大体有如下四种具体形态：

第一，制定、实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战略。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包括近期、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发展阶段和发展步骤，以及优化总体的对策和方案。（包括需要与之配套的总体政策。）生产力发展战略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的指导规划和设想，是决策部门实践活动的根本依据。

第二，国民经济管理。是依照生产力发展战略，由国家计划机关制定、实施和控制的，集计划、组织、指挥、调节、监督于一体的活动整体。反映在计划与管理中的除生产力增长水平之外，还包括社会文化、科技卫生等各个方面以及体制改革（经济、政治、科技等）对外开放等问题，其中决定性问题还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问题。

第三，地区经济管理。是针对不同经济地带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实施的管理。由于我国幅员大，人口多、民族多、科学技术和



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特点不一样，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各自优势，并在“全国一盘棋”的统一指导下，不同地带、经济区、特区的生产力得以分工和相得益彰地得到发展。

第四，企业生产管理。企业是社会生产力的原始细胞，是搞活宏观、中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它有自身的布局、规模、结构、时序、流程组织、投入产出、控制系统和更新规律。因此必须对企业的特殊规定性进行组织和管理。

以上，我们对社会生产力诸因素(子系统)组合的形态作了综合地粗略探讨。

当然，生产力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运行中的系统，它和周围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制约关系。因此，对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完整考察，不能不包括社会生产力的环境问题。但是，正如大多数学者所指出的：环境不属于生产力系统自身的东西。同时考虑到篇幅的局限，这个问题，我们将另外专门给予论述。



第五章

生产力系统中的科学技术*

第一节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 进步与经济的关系

一、科学

科学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的总和，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形式和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结晶，并在新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的理论。科学是人们征服自然、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的指南。离开了科学，就不可能有生产的现代化。作为生产先导的科学，其重要功能就是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人们的行动，挖掘和创造知识并提高人们利用知识的能力。科学是国家经济赖以发达的一个基本因素。

* 本章的许多观点、材料来自北京理工大学聂德林副教授的大力支持，这里谨表谢意。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根据现代科学的新发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科学知识体系划分的新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概括一切、指导一切的理论，并通过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这两座“桥梁”把自然科学、数学与社会科学连结起来。介于生产与科学之间的是技术。

科学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影响，主要来自：（1）提供规律性的新思维、新方向，从而为经济研究提供新手段；（2）转化为生产技术并在经济领域广泛应用，产生经济效益和“技术推力”；（3）科学技术推动新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4）科学渗透使经济管理日益进步，不仅节约人力而且提高效率；（5）科学可以强化生态效果，有利于生态平衡；（6）科学信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支柱，加快物质、能量的转换。

二、技术

“技术”原意是指个人的技能、技艺，也包括世代相传的制作方法、手段和配方，即人类为了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转换和能量传递，根据实践经验和科学原理而创造的各种活动手段、方法、技巧和配方。当代，技术已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社会技术整体，它反映的是社会技术装备的总功能，即从自然界获取物质材料、能量和信息，通过一系列输送、加工和转换，产生社会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服务效用的功能。是材料、能源、控制、工艺等技术系统之上的大系统。这个体系包括获取和控制技术，传输技术，加工转换技术，终端产品技术。

反映生产技术不断完善的技术进步，与反映认识世界和它的结构及其在宏观与微观发展规律的科学进步，二者长期以来都是平行发展的，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日益一体化，因此，在科学用语中，科学和技术逐渐被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提出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指它进入生产过程生产使用价值的现实力量来说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其他诸种因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之外，只能说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要把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经过几个中间转化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可以认为是朝着生产力方向的第一次转化。自然科学、综合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一般地说还要转化为技术科学即应用科学，这是第二次转化。但技术科学还不能直接解决生产力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它解决的是比较远期的生产方向问题。技术科学还得再向生产科学即工程技术转化，这可以说是第三次转化。但是，这些具体的工程技术还不等于是生产力，这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它们要物化在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劳动对象之中，即成为“硬件”；另一是它被劳动者所掌握，变成劳动者的实际操作技能、技巧等，它一般以工艺流程、生产的具体方式与方法、配方等等形式出现，可称为“软件”。这可以说是第四次转化。但到这里，科技仍然只是生产力的因素。要变成实际的生产力还要按照一定的技术构成，与诸种生产力因素具体地结合起来、运行起来，这就是由静态转化为动态，形成第五次转化。

当然，在上述科学技术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的总过程中，还可能出现跳跃和变形。应当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论述的。马克思曾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的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①于是，“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②恩格斯在指明了自然和人这两个生产要素之后写道，“还包括经济学家想也想不到的第三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3页。

②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页。



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① 马克思说：“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② 这些论述都表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基本观点。

科学技术为什么能成为生产力？一是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只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它和其他任何物质运动一样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可以被人们认识，可以被人们掌握，从而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时，也就成为生产的一种巨大力量。二是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科学知识体系是精神的东西，它是由物质转化来的，从而它也可以转化为物质的生产力。三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已由以下的事实证实：

第一，劳动力不再主要是体力，而是智力了。这不仅体现在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直接在社会生产中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上；而且还体现在生产工人所支出的劳动中，脑力劳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上。

第二，科学技术的运用使生产工具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代替人的体力劳动，逐渐转化为代替人的部分脑力劳动。由于使用了电子装置，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机器体系中又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动控制部分，它代替了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必须执行的控制职能，如观察、控制、测量、操纵、转换等等。这就使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改变着劳动对象的面貌，使劳动对象的品质，性能和用途等发生着明显的变化。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以及各种功能性新材料层出不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7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3分册，第350页。



第四，科学技术改变了管理的面貌。现代管理广泛地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它以运筹学、系统工程、电子技术等科学技术手段，从操作方法、作业水平的研究向科学组织的研究扩展，同时吸取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从而大大提高了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使人们可以及时拟定各种决策方案，进行最优化的选择，使人、财、物得以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第五，从科学技术运用实际创造的劳动生产率来看，它是当之无愧的生产力。例如，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的《小麦高产、抗锈的优良品质资源“繁六”及姊妹系》项目，创造了小麦的连年高产。20年来，累计推广面积2亿多亩，增产小麦3100万吨。^①

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因素所占比重：本世纪初不过5%~20%；而到80年代已达50~70%，有些国家甚至已经达到80%。以日本为例，其增长轨迹为：

年 份	GNP年增长率(%)	其中技术进步的 增长比率(%)	靠技术进步因素所 占的比重(%)
1955—1960	8.7	1.7	19.5
1961—1965	9.7	2.4	24.8
1966—1970	11.6	4.4	37.9
1971—1975	8.5	4.0	47.1
1976—1985	5.8—6.2*	3.9	61.2—62.9

资料来源：日本1987年科技白皮书。*为预计数字。

日本科技白皮书所列数字说明科技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巨大。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90年12月8日第1版。



第二节 科学技术发展的 基本特征和趋势

当代科学技术，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征：

一、科学技术的两位一体化

指科学技术在分化过程基础上，已统一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就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关系看，技术发展要以科学作为理论指导，而科学的发展又为技术的变革提供了新的后盾和依据。拿电子计算机来说，它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代数、逻辑、固体物理和电子学这样一些基础科学之上的。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科学的理论，电子计算机技术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而电子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新的基础研究。例如：程序设计理论、最佳控制理论、自动装置理论、人工智能理论，等等；同时，计算手段的进步，也为数学、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天文学、化学、遗传学、社会学、人口学等一些传统科学，带来了新的思维和方法论。

总之，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已融合成一个“科学——技术——生产”的有机综合体，呈现出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的新趋势。

二、科学技术阐述的理论化和数量化

指科学成功地运用了数学、符号标记，并由经验归纳向演绎推理转化。例如现代化学中新演绎理论体系层出不穷，其判断推理更加具有抽象的理论色彩和图象思维，更加数量化、符号化。

三、科学技术成果的物化

指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获得产品体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应用于社会现代生活。这里，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从研制到制成产品的时间越来越短。比如，蒸汽机从研制到



推广使用，经历了100多年，蒸汽机车是34年，涡轮喷气发动机是10年，平面型晶体管仅为5年，激光则更不到一年。

四、科学技术研究的社会化

现代科学研究项目、特别是某些高技术和科技尖端项目涉及众多的学科，要靠科技人员的集体智慧和努力甚至需要国家组织力量，使之形成国家级规模，组织联合攻关，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要攻克尖端科技的研究项目，或者重大技术上的难关，再采用手工业的小生产作业方式显然已不适应。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大力采用分工协作的社会化的甚至国家规模的组织形式，将成为世界一种趋势。

五、高技术领域将取得新的突破

90年代和跨世纪这20年中，下述六大高技术领域，将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并使产业的高度化、实用化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信息技术将继续对整个科技起前导作用。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第五代计算机将得到应用，并与先进的通信网络和为一体。光电子计算机可能在20世纪末取得突破，产业用机器人将具有知觉、判断和学习功能。

第二，生物工程将把成本昂贵、污染严重的“石油农业”改造成廉价的、无污染的“生物农业”。在医疗药品方面，将开发能抑制癌变细胞最有效的Y型干扰素等。

第三，新材料技术、新型氧化物、高度超导体，将在90年代中期进入实用阶段，陶瓷材料将广泛地取代金属。功能更多的新合金、非晶、粉末和烧结材料、塑料，将同钢铁一样被广泛使用。

第四，新能源技术、被称为第一代核裂变变电技术——热中子，将有新突破，潮汐能源和海洋温差能，将日益完善，并获得应用。

第五，航天技术的近期目标是利用空间站，开发空间冶炼、空间生物工程、空间医疗、卫星通信、太阳能发电、空间旅游等；远期目标是探索太阳系行星，在月球建立前哨基地，登上火星。



第六，海洋技术、海水淡化的新进展，将使淡水资源获得突破性的开发。从海水中提取核聚变燃料——重氢技术，也将在21世纪初开始实用化。

第三节 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

最先提出科学发展规律的是恩格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①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再次讲道：科学的长足发展“可以说是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②

一、科学加速发展规律

现代科学史表明，科学领域的许多指标，增长速度，都是与已有的指标数值成正比的。例如有人考证过，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平均每16年翻一番。譬如耶鲁大学图书馆在18世纪初期藏书1000部，假定由此开始每16年增加一倍，那末到1938年，该馆藏书应该增加到260万部。后来经调查，该大学图书馆1938年的实际藏书果真达到了274.8万部。还有人计算过学术杂志数量的增长速度。数字表明，美国1750年杂志数为10种左右，19世纪初期为100种左右，19世纪中期为1000种左右，1900年达1万种，20世纪70年代达10万种，由此得出结论：科学杂志是每60年增加10倍。

二、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规律

实践表明，不仅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加速的，而且科学技术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也是加速度的。科学技术成果从开始研制到投产应用所需的时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越来越短了。我们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页。



这种变化状态称为加速转化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从近代科学技术史中得到证实。请看下表：

近代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应用周期

序	发明或发现项目	开始研制或发明年份	出产品年份	从发明到投产所需年数
1	滚动轴承	1490	1900	410
2	硝化纤维	1655	1885	230
3	蒸汽机	1680(1698)	1780(1782)	100(84)
4	照相术	1727	1838	112
5	水泥	1756	1844	88
6	电话	1820	1876	56
7	电动机	1829	1886	57
8	电影	1832	1895	63
9	荧光灯	1859	1938	79
10	无线电收音机	1867	1902	35
11	汽车	1868	1895	27
12	滴滴涕	1874	1939	65
13	柴油机	1878	1897	19
14	真空管	1882(1884)	1915	33(31)
15	飞机	1897	1911	14
16	卡普隆	1899	1939	40
17	X射线管	1902(1895)	1920(1913)	13(18)
18	电视机	1922	1934	12
19	雷达	1925	1940	15
20	核反应	1932	1942	10
21	尼龙	1935	1939	4
22	原子弹	1939	1945	6
23	晶体管	1948	1953	5
24	太阳能电池	1953	1955	2
25	激光器	1960	1960	7个月

资料来源：夏禹龙等编著：《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4页。



三、科学技术知识新陈代谢加速的规律

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所运用的科学技术知识呈现出加速新陈代谢的明显趋势。据统计，在18世纪，知识新陈代谢周期大约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减少到30年，近50年进一步减少到15年，而当代某些领域内知识新陈代谢周期只有5~10年。这意味着，即使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如果他不再继续学习，也不可能成为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劳动者。这是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得以发展的理论依据之一。另据统计，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大约每5—8年，其运算速度提高10倍，可靠性提高10倍，成本降低十分之九，体积缩小十分之九。目前，一种新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平均寿命仅为5年，超过5年就将被更好的新电路所取代。

还有人估计，情报资料的平均寿命为：图书10~20年，研究报告10年，学位论文5~7年，期刊3~5年，国家标准为5年，产品样本3~5年。一般认为，情报资料的平均寿命大约5年，如果情报资料晚1.5~2年发表，其情报价值就要损失30%。

综上所述，现代生产力同现代科学技术是正相关在一起发展的。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生产力。其基本过程就是“科学——技术——新生产力。”它内含三个主要层次：生产力开发层——科学家、发明家；应用转化层——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生产操作层——劳动过程中的直接生产人员。现代化既取决于每一层次素质的提高，又取决于三个层次的协作优化。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指明。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已融为一体，国民经济的增长中60~80%是依靠的科技进步。因而，“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提高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64页。



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历来予以高度评价和高度重视，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泉源，是现代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基石，是落后国家跃升或赶上发达国家的重要枢纽。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①党和国家已经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我们发展战略的重点和国家意识的体现，并要我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而环顾全球的科技动向，考察一下世界新技术革命问题，就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7页。



第六章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 与中国的现代化

第一节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基本 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

当前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各国众多学者和政界人士，纷纷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预测着科技革命的新动向。现在，以高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工业，正在取代传统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新支柱。其中有代表性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世界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描述。

美国丹·贝尔于1973年就论述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他认为后工业社会有五大特点：一是劳动者的大多数将不再从事一二次产业，而转入第三产业部门，其中服务保健、科学研究、教育、管理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师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将占社会多种职业中的主导地位。三是科学的理论及



其实践知识,成为社会最受青睐的战略资源;各种智力密集的研究所、大学,将是社会最有地位、最具影响的机关。四是技术发展和进步将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和计划性,以避免有害的盲目性后果。五是强化管理,需要智力开发,需要更多地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使用电子计算机有助于发展智能技术和科学决策。约·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1982)中称美国社会发展已出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认为美国正在进行无情的结构调整,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在这个信息社会中知识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美国的基础工业、美国的贸易前景由此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影响涉及社会组织、结构、制度,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政治态度。他还把近十年看作是社会变革的过渡时期,要求人们作好迎接“全面信息时代”的准备。阿·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更明确指出农业革命是第一次变革浪潮,它使人类从原始的渔猎时代进入农业社会;工业革命是第二次变革浪潮,现在面临的第三次浪潮——以微电子、宇航、海洋、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群,将取代钢铁、石油、汽车、铁路等传统工业,这必然使生产力急剧发展并使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准则、意识形态受到冲击而发生剧变。

面对人们生活中的“爆炸”性形势,各国朝野人士纷纷研讨战略和对策。许多国家调整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重订科技发展的重点,把微处理技术、机器人、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作为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的开发课题,并加紧高技术工业的建设。例如,美国已经建立了近万个研究高技术的经济开发署,美国大公司正忙于协调关系,搞更大的研究集团,联合研究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技术和电算机技术、电缆电子技术。欧共体几家大公司已共同开发和研制出第五六代电算机。日本继过去“技术立国”的传统战略,重申要开发高技术系列,变资源不丰的日本为知识



密集的社会。

与战略调整同时出现的，还有：

——增大科研开发任务，扩大科技攻关投入的资金，如美、日、西欧，一方面加紧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已花了巨额科研投资，加紧了科研到研制的转化。

——大力开发新技术发展区。如美国的“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日本的“硅岛”，发展都很迅速。在这一开发区内工厂和大学、研究机构密切结合，并使之具备了发展高技术的资金、交通、信息、科学、技术和人才。

——改革教育体制，大力增加智力开发的投入，确立了把人才作为发展高技术、新兴科学的重点。

——提供保障新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立法、司法、放宽管限，制定优惠的诱导政策，并特别鼓励联合协作。美国明白宣布对为开发新技术而组成的联合集团，将不以反托拉斯法相约束；德国也以各种减免税政策，鼓励企业增加风险投资，搞高技术产业。

显然，上述动向，已体现出科学技术已开始进入一个新历史时期。一个新技术革命的巨浪已经涌来。

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

第一，新技术革命使传统产业群逐步让位于新兴产业群，并使后者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产业和骨干产业。例如电子工业就已具有战略性工业的身分。现在电算机装机量已过一亿台，用途三万多种，预计美国1991年电子工业产值可达6000亿美元，它每年可完成4000亿人年的巨额工作量。

第二，新技术在传统工业中的广泛应用，将改变原有的技术基础和技术结构，提供新的技术基础，使传统工业面貌迅速改观。例如钢铁工业采用计算机控制和管理，节约了大量能源，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等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机械工业采用微电子技



术，可使机械化向智能机械化升级发展。

第三，新技术革命改变了地区经济结构、布局和就业规模。例如发达国家竞相发展新型工业，逐步缩小了传统工业规模和比重，导致布局改变和结构改变，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不适应“密集”（技术）的生产方式而被排挤出去，加入了失业大军。智力型劳动者增加，相应减少了“兰领工人”比重，人员构成发生变化，流动性增加，职业教育和重新学习变得更加必要。

第四，新技术革命还引发了生产组织与管理的变革。过去传统工业产品品种单一，批量大，是纵向树型结构。新技术采用后，企业趋向小型化、专业化、分散化，纵向树型结构逐渐让位于横向网状结构。生产体制也走向多品种、小批量。从而大、中、小规模将出现并存的格局。

第五，新技术革命还促使劳动方式和内容发生变革。以往技术改革，主要靠延长劳动者体力、扩大能源、原材料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在则是扩大人的脑力、减少能源、原材料的消耗。以往技术革命主要解放人的体力，这次则是解放人的智力，很大一部分脑力劳动将为计算机取代。以往的技术改革生产者 and 工程技术人员泾渭分明，现在主要的直接生产者往往就是专家、工程师、知识分子，脑体界限大大缩小。

第六，新技术革命还将带来社会生活的大变化。电子微型计算机在社会生活领域广泛应用，将使社会生活走向信息化，并同信息联网打交道，从而将使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教育手段，消费结构巨变。

最后，新技术革命将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劳动与资本的较量有增无减，市场竞争和企业竞争更为尖锐，社会失业、通货膨胀等痼疾还可能激化。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必然服务于和依附于资本对最大利润的追求，其手段也依然是借助于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新泰罗制”来吮吸劳动者的剩余



价值。尽管在资产阶级政府干预调整下，也有可能使矛盾一时减缓，但社会动荡及蕴育着的矛盾，势将不可避免。

第二节 中国科技发展的基本战略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在于，可以利用有利时机，引进新技术，有重点的发展一批适合国情需要的新型产业，改造传统的农业和工业加工业。这样就可以缩小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反差；但是如果我们丢掉机遇，态度消极，处理不当，也会使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制定和执行一个科学的科技发展战略和若干配套政策，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是强国之本，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搞现代化，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把科技搞上去了，生产力也就会一日千里。我们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科技的适度领先，保持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适度同步性。然而，人们对科学技术与教育必须适度超前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必要性还缺乏共识。人们往往看重经济对科技、教育发展的制约，而忽视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后者本身就是生产力功能中的“渗透性”子系统，因而也往往把后者与经济系统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结果在经济上的急于求成也就无视科技与教育应适度超前，从而导致两者间更加不适应，经济发展欲速而不达。因此，人们不能只看搞科技的经济负担、财力负担，更要看到科技投入可以高产出、并获得高效益。因此把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在战略上贯通起来，协调一致，互相推进，才是上策。

其次，怎样使科技、经济在战略上统一，有一种主张目前我国只能集中资金和力量，优先发展传统技术，在具备了一定的经



济实力之后，再发展高科学、高技术。这种战略比较符合我国现阶段的技术发展状况和管理水平，有可能较快地达到工农业和G·NP翻两番的2000年目标。但是，这种战略也将不可避免地拉大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而不可避免地还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去调整产业结构，减慢我国在下一世纪初的经济发展速度。另外，还有一种主张：现在我国应以发展高技术为主。这种战略主张，有可能大幅度地缩小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把某些高技术产业搞上去，并更快地推动一些新兴产业群的兴起。但是，它也会相应地产生两大问题：一是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起点低，难以同高技术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使差距的缩小化难以为继；二是社会的基本需求仍要靠发展传统技术去满足，从而难以实现翻两番的2000年目标，并形成出口的竞争优势。上述这两种科技发展战略，都不利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因此，都不可取。

比较公认的正确战略只能是以发展传统技术为主，在科研、技术的引进上，传统技术与高技术并重，并以高技术中的电子信息技术作为带头技术，对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创造出大批高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技术复合体。”这种在传统技术中渗透高技术的战略，既可以保证“翻两番”，又有利于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逐步缩小同国外技术发展上的差距。显然，这种把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贯通起来的战略，是我们应取的最佳战略。

再次，在科技发展战略的主方向大致确定以后，还要在初级技术、中间技术、先进技术之间，作出正确选择，使之恰当结合。就目前我国实际情况而言，不是追逐所有先进的高技术，而是“尽量”采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先进技术，以采用先进者为方向，量力而为，可能是适当的对策。

复次，同上述思路相一致，我们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金



密集型技术之间作出科学地选择，把两者的积极因素，恰当的结合起来。单纯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都不利于贯彻前三项战略指向。我们应该根据自己不同阶段上的具体条件，因地制宜，掌握好宜“劳”则“劳”，宜“资”则“资”的适度性与力度，逐步增加资金密集型技术所占的比重。

还有，要把发展教育与科学事业、促进智力发展的需要，同发展科学技术的需要统一起来。没有教育事业的适度超前，科学技术也就难以在四化事业中起带动作用。因此，要上科学技术，必须相应上好教育。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创造教育能够大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应该是“大科技”战略中的当然的组成部分。

最后，还要把发展科技与改革体制结合起来。只有不失时机地革除现行体制中束缚科技发展的种种弊端，逐步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各项管理体制，才能保证科技发展的总目标得以实现。

第三节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兼驳两种制度“趋同论”

当代不少西方学者，津津乐道于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推动作用，鼓吹用统一的“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中性概念，代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概念，企图论证“工业发展”、“科技进步”，可以独立地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最终融合而成为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世界大同”社会，竭力论证共同的工业目标和科技进步可以自动调节和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而无视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影响。这完全是不符合当代客观实际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和曲解。



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譬如资本主义的国有化、股份化，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本性和阶级实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所谓计划化和国家干预经济，并未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熨平资本主义的波动周期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收入均等化”，不仅没有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反而促使贫富的差距和对立更加扩大。同时，社会主义改革中导入了市场机制，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已趋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实行了公有制主体下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允许私有制存在和发展，实现了所有制上的两权分离，这并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趋近。因而，所谓“趋同”云云，不过是旨在混淆两种社会经济制度根本对立和区别而泛起的自由化思潮。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正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我们同一切“左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要划清界限，就必须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发挥优越性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但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又是目的在于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现代化，因此在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的同时，既要作到“四个坚持”、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时又要克服社会主义现行体制上的弊端，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摒弃与发展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改革就是经济、政治体制的创新与完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统一起来，生产力愈发展、就愈要坚持好和捍卫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改革掉体制上的弊端。把这两者分割开来，孤立起来是十分有害的，它既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又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和实现深化改革。



责任编辑 赵文林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项启源 曹天启 主编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25 插页7 字数389千
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366-1624-4/F·87

定价：8.85元



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第一批书目

- | | |
|--------------|--------------|
| 蝉螭学 | 李隆术 李云瑞著 |
| 变形体非协调理论 | 郭仲衡 梁浩云 编著 |
| 胶东金矿成因矿物学与找矿 | 陈光远 邵 伟 孙岱生著 |
| 中国天牛幼虫 | 蒋书楠著 |
| 中国近代工业史 | 祝慈寿著 |
| 自动化系统设计系统学 | 王永初 任秀珍著 |
| 宏观控制论 | 车以石著 |
| 法学变革论 | 文正邦等著 |

第二批书目

- | | |
|--------------|----------------------------|
| 中国自然科学的现状与未来 | 全国基础性研究状况调研组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局 |
| 中国水生杂草 | 刁正俗著 |
| 中国细颚姬蜂属志 | 汤玉清著 |
| 同伦方法引论 | 王则柯 高堂安著 |
| 宇宙线环境研究 | 虞震东著 |
| 头位难产 | 凌萝达 顾美礼主编 |
| 中国现代工业史 | 祝慈寿著 |
| 中国古代经济史 | 余也非著 |
| 劳动价值的动态定量研究 | 吴鸿城著 |
|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 吴光辉等著 |



- | | |
|-----------------|-------|
|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 | 尹韵公著 |
| 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与事实 | 陈平著 |
| 艺术教育学 | 魏传义主编 |
| 儿童文艺心理学 | 姚全兴著 |
| 从方法论看教育学的发展 | 毛祖桓著 |

第三批书目

- | | |
|---------------|----------|
| 奇异摄动问题数值方法引论 | 苏煜城 吴启光著 |
| 结构振动分析的矩阵摄动理论 | 陈塑寰著 |
| 中国古代气象史稿 | 谢世俊著 |
| 临床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 江正辉主编 |
| 历代蜀词全辑 | 李谊辑校 |
| 中国企业运行的法律机制 | 顾培东著 |
| 法西斯新论 | 朱庭光主编 |
| 《易》与人类思维 | 张祥平著 |

第四批书目

- | | |
|-------------------|-----------|
| 计算流体力学 | 陈材侃著 |
|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环境 | 郑洪汉等著 |
| 质点几何学 | 莫绍揆著 |
| 中国城市昆虫学 | 苻书楠主编 |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 李景源主编 |
|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 | 项启源主编 |
|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 | 李凤鸣 张海山主编 |
|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华文明 | 王戎笙主编 |



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

莎学

中国现代诗学

汉语语源学

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

王佐良著

吕进著

任继昉著

邓启耀著



重庆出版社为振兴我国科学学术著作出版事业，特拨出100万元专款，设立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同时邀请国内21位著名科学家、专家，组成本基金指导委员会。

这项基金专门用于资助出版具有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今后每年将陆续拨款，继续资助出版优秀科学学术著作。